百家丛书

敝帚一把

鲍彤

·百家丛书·

敝帚一把

鲍彤

人民日报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百家丛书·
敝帚一把
鲍 彤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人防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5.5 字数85千字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2500
书号：10132·096 定价：1.50元
I S B N 7—80002—047—9/I·27

编 者 的 话

《百家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愿把这份精神上的礼物，奉献给一切关心改革、思考改革和从事改革的人们。

本丛书定名为“百家”，是取“百家争鸣”之意。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国内专家、学者、作家和各界人士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的著述和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著述和作品，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小小的百花园和群言堂，使之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交流信息，启发心智的作用，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为本丛书投稿；欢迎对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教。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1987年

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
——同年轻的朋友们谈谈心…………（3）
谈方法
——为《方法》杂志创刊作……………（12）

1986年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
——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17）
政企分开和工作效率
——谈谈改革的一种思路……………（26）

1980年

论淘汰在新长征中势在必行……………（35）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意见…………（41）

1979年

发明者应当受奖励……………………（51）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55）

1978年
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77)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几点看法……………(85)
日新月异和标新立异……………………(98)
1964年
明辨是非的两个基本条件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笔
记………………………………(105)
热情地欢迎和关心新生力量……………(109)
1963年
耐心把别人的意见听完…………………(117)
就地学起　就地做起……………………(121)
要做勤务员，不要做官老爷……………(123)
1962年
发扬愚公精神……………………………(135)
做老实人…………………………………(140)
要靠说服力………………………………(144)
用商量和请教的口气说话………………(150)
不能“揠苗”,但要“助长”……………(153)
1961年
从思想教育入手…………………………(159)
附　录
七律·哭安子文同志……………………(163)
少年游·为母校上海南洋中学九十周年
寿……………………………………(165)
跋………………………………………(166)

1987年

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

——同年轻的朋友们谈谈心

马的品种无疑是有优劣的：有骏马，有驽马。骏马和驽马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这匹马一天可以走几百里，那匹马只能走几十里。

但是，能不能拿骏马的幼驹来同发育成熟了的驽马相比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骏马较驽马为“劣”呢？不能。这是常识以内的事情，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谁要是以骏马的幼驹不如驽马而得出骏马不骏的结论，必被人指为荒诞，因为他在进行比较时没有考虑到显然不可比的因素：这匹幼驹，远没有发育成熟；而那匹驽马却早已进入役期了。

在分析、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时，也应作如是观。比，只能也只应比那些可比的因素。不可比的因素，应该排除在外。这叫做符合科学，这才是客观的公正的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照我看，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立足点

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才二十多年，其中还经历了十年的灾难，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仍然已经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尽管只是初步地显示出来，尽管只是“小试锋芒”。我们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彻底地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我们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广泛地解决了工人失业的问题；我们在解决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上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好得多；我们也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地解决了吸毒、聚赌、卖淫、抢劫、凶杀等社会问题。即使加上那起负作用的十年，也不过三十多年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小试锋芒”就有了这样大的成就，靠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要是冷静地公正地观察问题，本来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的。

问题还是在于“幼驹”。有些青年朋友，他们也是出于爱国热忱，渴望我们的祖国早一点繁荣

兴旺，富裕发达，但比来比去，“发现”社会主义的幼驹在某些方面还赶不上资本主义的老马，就惶惑了，茫然了，感到无法解释了。他们忧心忡忡地向周围的师友发问。有的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有的得到了相当勉强的回答——回答者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当然无法作出透彻的解释；有的却得到了不负责任的回答。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肯定了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照我看，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立足点。脚应该站在地上，这是最大的实际。悬在空中，就会失去准头，一不小心，还可能脑袋朝下，把客观世界看得颠三倒四。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在党的幼年时期，曾经有不少同志弄不清楚当时阶段的性质，有的提出了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有的提出了照旧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同他的战友们一起，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为当时的革命指明了性质和方向。现在，我们同样必须弄清楚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这对于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我们的认识，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稍为年轻一点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应该发愤，用集体的智慧把这本书“写”出来，尽量“写”得好一点

毛泽东同志当年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稍为年轻一点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应该发愤，用集体的智慧把这本书“写”出来，尽量“写”得好一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社会集团的利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的领导，等等。所谓“写”，既包括再认识，理清思路；也包括继续实践，实现现代化。几十年后，“写”好了这本书，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向子孙们提出一个新的任务，让他们去“写”一本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书——当然，那个时候叫什么阶段，可以由他们自己去思考。但在当前的几十年内，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写”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本大书。

的确，这是个浩繁的工程，非穷几十年的时

间不能竟其功。少了不行。与其把时间设想得短一点，毋宁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我们的邻居苏联，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快七十年了。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个认识过程：最“高”的时候说是处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阶段；后来又说是处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来又说是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门口。现在则认定他们仍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教训里得出结论：在社会阶段的判断上，切勿犯急性病。我想，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十年是最起码的计量单位，认为几年或十几年就可以迈上一个什么台阶，恐怕只能在主观想象中存在。封建社会在不同国家存在过几百年，一千年，两千年；资本主义社会也活了几百年，至今虽已疾病缠身，但在看得见的时间内也未必遽尔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发展阶段，如能用几十年来计量，大概就是最快最快的了，也许其中的某些阶段还得用一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计量——我没有研究，不敢妄下断语。

克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不能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克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缺点，不能把我们自己撕碎砸烂一样

确认我们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许多思想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比方说，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为什么至今尚未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为什么至今仍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为什么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什么在改革和建设的问题上都不宜提出过高的目标和过急的要求，等等。

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脚是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水平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谁也不可能在海市蜃楼中生活。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克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不能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克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缺点，不能把我们自己撕碎砸烂一样。恨铁不成钢的心是好的，但是光有好心还是不成的。为了使铁成钢，需要的是锻炼，而不是把铁扔掉。你把初级阶段的"铁"扔掉了，哪里还会有高级阶段的"钢"?

话还得回到"幼驹"上来。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三十多年历史，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有比他们值得自豪的好东西，这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我们选择了比资本主义制

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确实有不如他们的地方，但这不能归因于社会主义，而应当如实地归因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他们却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点，其实也很清楚。只要看一看有些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清楚了。只可惜，现在介绍这些国家现状的读物不多，一谈到资本主义，往往介绍一些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或者虽也谈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却往往只谈一些有特殊条件和特殊机遇的小国或地区。不可比的因素愈大，对比中的不可靠性、不真实性也愈大。

这是不是讳疾忌医呢?不!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缺点。共产党自己郑重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务，正是为了克服而不是掩饰这些缺点。

民主，是有程序的，有制约的。自由，是有边界的，有法制的。搞运动，无助于建设民主政治。中国吃"运动"的苦还少吗

多少年才能实现改革的任务？这就又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有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不能揠苗助长，这个道理，许多同志都懂得。谁能在一夜之间就把市场体系从口袋里端出来呢？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需要有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不可操切从事，这个

道理，还有不少同志不大理解。其实，要理解也容易。切切实实地组织好一次班会，组织好一次学术研讨会，组织好一项业余文娱生活，就会懂得此中大有文章，大非易事。学校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算是比较单纯的，大学生在社会成员中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全民族的文化素养的提高岂能一蹴即就？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靠扎扎实实的建设，只能逐步积累。民主，是有程序的，有制约的。自由，是有边界的，有法制的。搞“运动”，无助于建设民主政治。中国吃“运动”的苦还少吗？现在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的出生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有的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有的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踩躏中国之时，有的出生于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统治之日，有的出生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他们见过一些沧桑，深受动乱之苦，莫不为现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额手称庆。更年轻一些的同志和朋友，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懂事了的，也同样懂得安定团结之可珍可贵。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把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持续地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越安定团结，我们的改革就有可能进行得越顺利，时间就有可能缩短。反之，如果安定团结遭到破坏，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被推翻的。但是，动乱的干扰一旦出现，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势必被迫推迟，这显然是违反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迟了十年，至今使人痛心疾首，难道我们还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再白白地推迟几年吗？谁愿意呢？谁忍心呢？谁下得了手呢？

1987年已经开始了。新年伊始，想点国家大事，很有意义。想到一些话，拉拉杂杂地写出来同青年朋友们讨论。

（原载1987年1月5日《人民日报》）

谈 方 法

——为《方法》杂志创刊作

我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灵药。比方说，能治顽癣的未必能治便秘。也许天上有，反正人间没有。传说中的华陀，好象口袋里也不只一种药，何况还有许多“洋”药，如阿司匹林和配尼西林，华陀没有尝过，比华陀晚一千多年的李时珍也没有机会尝过，尽管现在都早已是常用药了。

我也不相信有适用于人类各种活动的方法。跳舞的方法大概不同于钓鱼的方法。对象都是鱼，养鱼同煮鱼乃至吃鱼的方法也不可一概而论。即使是一种活动，比如写小说，好象鲁迅就不大相信什么“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当然，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是否已出现了新的、足以使鲁迅相信的“小说作法”，孤陋如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不知道。

那么好不好出一本专讲方法的杂志呢？看我倒是好的。杂志的好处在于“杂”。一杂，就不那么抽象了。一杂，就不那么单调了。一杂，就有所比较，可以引起人们思考了。

由此引伸出一条关于如何编《方法》杂志的方法的建议。——编者无疑已经考虑了许许多多方法，我只想画蛇添足，在许许多多的方法之内或之外，加上或重复一条：把杂志办成“杂”志。驳杂不纯比千篇一律好，兼容并包比呆板单调好，博采众长比只此一家好。可以坐在井口钓鱼，但最好不要拿起钓竿来排斥渔网，或者用钓鱼的方法来否定养鱼、烹鱼、吃鱼的方法。就算钓鱼，倘能介绍适用范围各不相同的方法，如钓活水鱼和死水鱼、深水鱼和浅水鱼的方法，健身者钓鱼和牟利者钓鱼的方法，以及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钓鱼的方法，乃至古代垂钓的传统方法和现代较为流行的方法，说明这些方法不断有所发展，至今未臻极境，想必更会受到欢迎。

“可见你并不反对讲方法！”对的。方法之重要正与药物相似。不相信人间有包医百病的灵药的人，生了病也非常想吃好药，只是不吃那种据说可以普救众生的仙药而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理是具体的。

方法也是具体的。要具体，就不怕杂。把《方法》杂志办成“杂”志，这个杂志介绍的方法就也许有可能成为使人得益的方法。

（原载《方法》杂志1987年第1期）

1986年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

——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舅舅死了。死意味着永诀。但这些天，我阖上眼，舅舅的音容笑貌就反复在我面前出现。他总是在议论，不断地议论，论文，论政。远远近近的往事，纷至沓来，交织在一起，又渐渐分开，有的趋于淡化，有的越来越明朗。

二十年以前，也就是那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个年头的上半年，气温骤然下降，从春寒突如其来地倒退到漫长的严冬。万马齐喑。只有声讨《海瑞罢官》的尖叫声倒处处可闻。在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上，有人念念有词地在历诉吴晗同志的“罪状”，许多人用惶惑和沉默来表示抗议。对聒噪的乌鸦，舅舅不屑苟同。对被迫噤声的同志，舅舅是同情的。但他不允许自己沉默。他说话了。“不过我想，贪官总不比清官好……”，“不过我想，用文海战术是不能判断是非的……”，“不过我想，……”——一半普通话，一半硖石

乡音，短短几句，语惊四座，掷地作金石声。乌鸦说，这是马，并且胁迫别人也必须把鹿说成马。舅舅说，这是鹿，你不能靠黑压压的文海战术来封住别人的嘴巴，或者强制别人跟着你胡说八道。的确，吴晗同志是舅舅的挚友，但舅舅当时想到的不仅仅是友情，他是在为常识说话，他要维护常识。他深知，一个民族，一旦把常识丢掉了，随之而来的必是大灾大难。本来是常识，一遇到非常、无常、反常的气候，却成了大不韪。于是，是非问题就成了安危问题。当时我在外地，没有身历其境。我只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他的几句“尖端”的话，那些更“尖端”的话是几天后才知道的。回到北京，我去探望他。我心情非常沉重，舅舅却谈笑自若。我婉转地请他“三思”，他淡淡地说：“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他反问：“我说得对不对？”我支支吾吾。他望了我片刻，一种责备的目光，不，应该说是怜悯的目光，好象在说：“我的可怜的没出息的外甥！”我战慄了。他是一位不懂人情世故的老孩子，通常不大会体贴别人的心境。但这次，象非常体贴他的被迫噤声的同志一样，也非常体贴我，他轻轻一转，捡起了别的话题，从此再也没有重提这件事。他怕我难堪。确实，我很难堪，惭愧。我，以唯物论者自居；他，从来不说自己对唯物论有

多少研究。但是，在惊涛骇浪中，他比我勇敢，坚强，镇定。真理所在，安危在所不计。"我是想过以后才说的。"舅舅说了他想说的话，也承担了他决非没有考虑过的风险。

谁说共产党人不能向非党人士学习？不仅可以学到知识，学到礼貌，而且可以学到……党性！是的，舅舅使我懂得，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可以从非党人士身上学到党性——明辨是非的党性，尊重常识的党性，追求真理的党性，告诉别人真理的党性。

舅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人们常常说他是一位汉学家。他确实是一位渊博而有独到见解的汉学家。他爱汉学，因为他爱中国。爱中国，可以爱科学，爱技术，爱经济，……但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在中药店里当了五年学徒，条件不允许他接触其它更有益于拯救中国的学科。在他的四哥、我的大舅舅吴其昌教授——梁启超、王国维、唐文治等国学大师晚年的学生——的熏陶下，他选择了汉学一途。于是出现了"离奇"的现象。他进的是浙江嘉兴的秀州中学，一所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半工半读，用两年半时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却终身与基督教无缘。他在燕京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得的也是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英文造诣极深，却终身潜心于中国文

化：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国的史料典籍，中国的辞赋诗词。他在燕大二年级时发表的学术论文，得到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的推崇，被誉为"文史无所不通"；他本人在当时和此后半个世纪内，一直同日本汉学界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但民族大难当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是坚定的抗日派，不做妥协派，更不当投降派。最初赏识他的，除了顾颉刚先生，还有胡适之先生。胡先生甚至用一些溢美之辞来奖掖他，知遇之甚，可谓至矣！但是，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舅舅才二十几岁，就同胡适之就抗战还是妥协展开论战，分道扬镳。他个人的乐趣在治学，探源正本，考异钩玄。但他知道，在那个时候，民族的最强音是不当亡国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各大学讲学之余，用了很大的力量撰写时局政论文章。如果说，今天，由于写了《红楼梦探源》和《探源外编》，他被许多人称为红学家；那么，在抗战时期，他是被许多人称为抗日政论家的。他的最后一篇抗日论文是为重庆《时事新报》写的社评，题目大概是《日本投降指日可待》，是在日本投降的上一天写的。第二天，评论见报，几小时后，电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暑假，舅舅，伯升舅母，令徽和令安两位妹妹，到上海来，住在我们家中。加上别的亲戚，主客

十二人，挤在总面积二十五平方米的两间亭子间中。长辈们睡在床上，晚辈都睡在地下，天气又燠热，无法歇息。大人们常常作彻夜谈，孩子们也不愿睡，都赖在边上听大人谈话。我当时十三岁，初中刚毕业，他们谈的许多内容现在都忘了。唯独谈的那篇《日本投降指日可待》的社评，以及舅舅爽朗的笑声，使我感到胜利的喜悦和民族的骄傲。"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抗日文章"。舅舅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

抗战使舅舅拿起政论的笔，胜利并没有使他放下。他接触了政治，认识了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许多朋友。他放不下政论的笔。他是《观察》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也在1946年暑假，储安平先生到我家来找舅舅，谈办《观察》的事。那是一天下午，我母亲见有贵客到，没有别的东西招待，就把准备充当晚饭的南瓜盛出来敬客。看到母亲把一碗南瓜端给西装革履的储先生，我觉得有点窘，舅舅却从容不迫地对储先生说："好，好，老黄南瓜，老黄南瓜，我五姊亲手做的，尝尝！"他们谈了好久，好些我都似懂非懂，只有一句，我听懂了。舅舅指着我，对储先生说："他是我的外甥，快上高中了，你送他一份《观察》吧。"储先生欣然允诺，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名字。从此，我每星期收到一份邮

寄的《观察》。我每期都读。我不完全同意《观察》的观点，但是，它告诉我许多关于时局的信息，也使我知道了钱端升、费孝通、潘光旦、雷洁琼、樊弘以及其他许多教授的观点。舅舅的文章，我当然读得更仔细些。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我从初中三年级起，就陆续受到来自教师和同学的一些启蒙教育，因此，我认为，他当时似乎还不大了解下层劳苦大众，不大了解我们党。但是，看到他骂国民党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笔势纵横，淋漓尽致，真使人痛快。是的，他爱中国，但他决不爱中国的黑暗的东西。

第二年，1947年夏季，他又到上海来了，又挤在我家的两间斗室之中。牛津大学聘他去讲学。国民党教育部的朋友则告诉他，他被列入了黑名单，中央大学要解聘他。于是，他就经香港到英国去了。后来，1962年9月，他回国后的最初几天，我去看舅舅，正好翁独健教授也来看他。翁教授一进门，他们两位就做了一个几乎要拥抱的姿势，翁教授称舅舅"老吴"，舅舅称翁教授"勒·柏蒂"，相视而笑。他们二位在燕大是住同一间宿舍的，"勒·柏蒂"是当时燕大同学向翁教授亲昵地打趣时所常用的法文诨名。翁教授说："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舅舅说："我没到英国就想到要回来了！郭老可以作证！"原来1947年舅舅在上海上

飞机，一到香港，就去找郭老。郭老夫妇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住在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当时是夜间，孩子们都睡在地上，舅舅蹑起脚尖，从孩子们的身上跨过。舅舅对郭老说："中大要解聘我，牛津要我去，我还没有拿定主意。"郭老说："去好！不过不要太久。太久了，国内的情况你就疏远了。"舅舅对郭老说："你看我什么时候该回来，就给我写封信。"确实，后来郭老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向舅舅发出的聘书，我见过，时间是1962年，编号是001。

这是我1962年才知道的事。但在此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舅舅总是要回来的。解放以后，我给舅舅写过两封信。一次是1956年，我以共产党员的矜持（应该说是幼稚），很不得体地问舅舅："对人民政府的观感如何？"简直象外交谈判。舅舅很诚恳地回了我一封长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好。有的朋友告诉我，新政权不好。我已观察七年。我认为，新政权比旧政权好得多。"第二次是1959年，我以替母亲代笔，姊弟谈心的形式，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些老气横秋的话，如"务必令二侄说中国话，学中国字"，另外也有一些稍为委婉的话，如"异岛雾重，故国春好，廉颇未老，想必能饭"。舅舅给我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他说："你提出廉颇的典

故，想来是两层用意。如问我身体如何，我告诉你：两鬓多情，对镜未白，群牙无力，遇食先摇。如问我何时回国，我的回答是，廉颇离开赵国是出于无奈，被迫的，我当然是要回到中国来的。”这两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可惜，1966年8月，我被抄家，从此散失。

1962年国庆前夕，舅舅回来了。这对舅舅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正是“大跃进”后三年的困难时刻，舅舅不是不知道。那一年，牛津大学向舅舅提出要续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也聘他去当教授。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大学聘他去当中文系主任。令安妹中学毕业，获得英国教育部为中学生设立的最高奖学金，可以免费任择牛津、剑桥等最高学府。但是，既然郭老请他回来，可见国家有此需要，他就举家回国，毅然决然，义无返顾。他的心，在中国。穷？“我是中国人，不怕中国穷。”挨斗？“即使预先知道有这场‘革命’，我还是要回来的。”为什么？还是舅舅自己的话：“爱国，总是要付点代价的。”

舅舅，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句话：您认为什么是爱国者的责任？舅舅，您永远不可能用语言来回答我了！但是，舅舅，我知道您的答案。您一生的经历和事迹，就是您的答案。

我见到过一些很爱国的人。他们想把中国的

一切都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很善良。但是，如果把信念建立在缺乏了解——更不用说自大或者排外了——的基础上，那么，一旦打开窗户，难免眼花缭乱。舅舅在牛津讲了十五年学，还到过欧洲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到过日本，五大洲都有他的老师、学生或者朋友。他了解中国，也了解世界，不断加以比较。他知道，护短于国无益，爱国不在自吹。他知道，中国并不全好，外国并不全坏。外国有比中国好的东西，中国有比外国差的东西。他不爱中国的坏东西，比方说，他从来没有爱过那个"文化大革命"。他只爱中国的好东西，爱中国的解放，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爱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国人，中国的爱国者，应该致力于中国的进步。穷，把它变富。落后，就努力前进。

舅舅，您为什么爱中国？

因—为—我—是—中—国—人！

舅舅，什么是中国人的责任？

使——中——国——好——起——来！

舅舅，舅舅，请安息吧！三天以后，您将长眠在您青年负笈和晚年治学之地。您心爱的中国，将在后死者的努力下，越来越好，臻于现代化。

1986年9月9日晨3时

（原载198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政企分开和工作效率

——谈谈改革的一种思路

政企分开，既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结合点中的一个。

旧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政企不分。所谓不分，主要不是企业办了政府的事，而是政府办了许多应该由企业去办的事。其后果：一方面，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机关陷入本来应该由企业自行处理的琐务之中。也就是说，企业被束缚住了手脚，无权办事；各级政府机关十个手指要按几十几百个跳蚤，无力办事。企业有力无权，政府机关有权无力，两者都影响了效率。

曾经有人认为，把企业的事集中到政府来办，把下级政府的事集中到上级政府来办，就叫做“加强”和“提高”领导。错了。积三十年之经验，深知如果采取那种体制，只能削弱和降低领

导。打个不太确切但毕竟可以意会的比方，就象团长做了班长的事一样。

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这也正是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下放权力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由来。

政企分开有两条可以考虑的途径：一是明确规定企业的权力，二是明确规定政府的权力。这两条，相辅相成，但又有差别。看来，必须双管齐下。

能不能单管独下呢？单管独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内无疑是能起积极作用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举例说，如果只规定了企业的权力，宣布企业有十条或者二十条权力，这固然很好，但难免发生一种常见的错觉，似乎企业只有这十条或者二十条权力，而其他一切权力好象都属于政府，好象政府干预企业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

我们前一段着重扩大企业自主权，对不对？对的。改革非从扩企业之权起步不可。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企业几乎无权这一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扩权无疑是一个积极、有效、大胆的决策。同六七年以前比，现在企业的自主权大得多了，因此也活得多了。问题在于，改革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政府在经济事务方面的权力也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并作出相应的规定。而这正是我

们目前的弱点所在。

我个人认为，体制改革的最后结果，应该对各级政府机关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的权力作出明确的界定。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应该达到这一步：除了违法的事情以外，企业都可以做；除了按照政府规章必须报批的事情以外，企业都可以而且应该自行决策和自行办理。

这样，就经济活动而言，岂不是企业的权力多于政府的权力了吗？如果一定要讲“多”论“少”，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最大量的经济活动理应由企业来承担。但企业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力是不同质的东西。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权力，本来就是企业的，各级政府机关对此只有保护之责，而无侵犯之权。至于宏观控制的权力，则当然属于政府，任何国家，企业都必须服从政府的法规，国际通例如此。对不同质的职权，不能作数量上的比较，这是常识以内的道理。政府管政府的事，企业办企业的事，各有各的权力。各司其职，各行其权，有条不紊，才谈得到经济工作的正常秩序。

这是我对改革的一种思路。可行与否，需要讨论。即使可行，从思路到方案，从方案到实施，还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认为思路应当探讨明确。

我们正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如果上述思路大体上可以成立，那么，我们经济活动的现状是：“除了明文规定属于企业的权力之外，都是政府的权力，都必须一一上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动手。”将来则是：“除了明文规定属于政府的权力之外，都是企业的权力，不必也不应该层层报批，而应由企业自行决策。”这个转变，我认为，也就是从以直接控制为主到以间接控制为主的转变。

这样做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明显的：可以使我国的企业具有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恰恰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呢？要看工作。弯子拐得太陡，也许有危险。因此，在改革过程即过渡时期，企业有责任向政府申报的事情必然会稍多一点。先多一点，将来再少一点，这样可能比较稳妥。问题在于，现在的多一点也罢，将来的少一点也罢，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布告周知。

能够作出明文规定的权力，毕竟有限。在政府权力与企业权力之间，总会有一个模糊地带。国外法学界关于中央政府权力和地方政府权力问题，研究了几百年，也还有不少扯不清的皮，政治学的术语把这个模糊地带称为“剩余权力”。在过渡时期，在经济问题上，遇到这类政企之间扯不清的“剩余权力”，恐怕可以这样处理：小事由

企业自行处理，大事仍然应向政府申报。但是，政府有关机关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批准与否的答复。政府逾期不复，或不要求企业补报有关决策资料以备进一步审议，则应一概视同认可。果能如此，即使在过渡时期，工作效率也能大大提高，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写到这里，大体上可以结束了。但意犹未尽，再补充两点。

补充之一：政府各部门之间，如果互相扯皮，甲部门开绿灯，乙部门开红灯，效率还是难以提高。这叫做政令不统一。这种现象，同机构林立、重床叠架有关。因此，精简机构，在所必行。这也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但已越出这篇短文的范围，这里只能点一下，置而不论。

补充之二：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养成了一些自己不知信息、不会决策、不敢负责、事事请示上级的“企业家”。万一这些“企业家”的请示雪片飞来，却又都要求上级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答复，怎么办？好办。如果他们请示的问题确属政府权力范围以内，那么，给以指示就是了。否则，可以印好一种公文作复：“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应该你们自己动脑筋。”在复杂条件下能够独立工作，是当年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延安整风时也强调过这一点，确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

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只有在有职有权的条件下才能大量涌现。而政企分开，正好能够创造一种机制，迫使那种事事等上级拍板的“企业家”减少一些，促使真正的企业家得以应运而生。

（原载1986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1980年

论淘汰在新长征中势在必行

写下题目，赶紧声明：不是什么论文，只是一点点小杂感而已。

小杂感何必冠以大题目？其一，实在想不出别的足以达意的题目来。其二，在大题目底下抛块碎砖头，也许侥幸能够引来更多的玉。

进行新长征，就是向现代化前进。这是我非常赞同的。正因为赞同，所以也来呐喊，插一句嘴：新长征同时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尽管前进使人高兴，淘汰则似乎有点煞风景，但是淘汰之值得庆祝，正与前进相同。幸而恐龙早已成为化石了，或者说，被淘汰了，否则，人类不可能出世，更不可能主宰世界。所以，对前进和淘汰，必须配合起来同时加以考察。

在新长征中，有四个字是一定要做到的：多快好省。真心提倡这四个字，就不能讳言淘汰。淘汰什么？不多不少，也是四个字，叫做少慢差

费。真心站在多快好省这一边，见到这种淘汰，一定不会掉眼泪，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欢呼：实在该淘汰！

现在，许多同志正在为效率大声疾呼。这是非常正确的。高效率同现代化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我甚至想，如果在高效率和现代化之间划一个等号，大概也不至于太离谱的。而效率的提高，也是一种淘汰，起码要把官僚主义淘汰掉。在效率和官僚主义之间，没有两全之策。官僚主义是一副套在效率身上的镣铐。如果把镣铐错当作项链、手镯之类的宝贝，舍不得割爱，些么，镣铐也许保全了，效率就被束缚住了，解放不出来了，提不高了。

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也是一种淘汰：对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的淘汰。革新革新，不革不新。要新，就必须有所革，有所淘汰。科学技术之所以是伟大的生产力，就在于它能够淘汰过时的东西。科学技术也必须在淘汰旧东西的过程中，才能使自己成为伟大的生产力。能不能“普渡众生”，让旧东西也买一张船票，同新东西一起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去呢？诚然，如果铜壶滴漏能够象手表一样戴在腕上，如果驿马能够跑得跟传真电报一样的快，那是可以而且应该把现代化的船票卖给它们的。可惜那些旧东西不仅成本太

高，而且体积庞大，笨重之极，勉强搬上船，就会象李清照在一首词里所说的，“载不动，许多愁”，没法启航，结果，势必把新东西也耽误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注意质量，都在择优。选拔人才，要择优；采购商品，要择优；一项工程，几种设计方案，采用哪一个，也要择优。不择优而择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种苦头，几年前已经吃够了。择优就必有淘汰。其实，择劣也是一种“淘汰”，只是方向相反，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倒车就是了。

可见，同一个过程，从正面看，是前进，因为它在趋向未来，从反面看，必是淘汰，因为它在离开过去。正反两面，总是形影相随的。谁见过只有手心没有手背的人呢？谁见过没有脊背只有胸膛的人呢？前进和淘汰是一对双生子。每一个肯定，同时都是一个否定。推而广之，尊重科学是淘汰，淘汰迷信。提倡学习是淘汰，淘汰夜郎。“开动机器”也是淘汰，淘汰只会照抄照转的“收发室”。

现在可以总括起来说一句：搞现代化，就是要把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非现代化的东西淘汰掉。当然，这项淘汰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一步一步来。

在这个布新除旧的过程中，现代化的东西和非现代化的东西，相当一个时期内无疑是会同时并存的。但从总的趋势来说，现代化的东西总是要逐步发展，逐步取代非现代化的东西的；非现代化的东西如果不朝现代化的方向进行改造，势必或迟或早被淘汰。至于淘汰的速度和规模，则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总的速度和总的规模。又要快快前进，又想慢慢淘汰，就象又要跑步，又要影子不动一样，难极了，难到办不到的程度。

所以我认为，在新长征这篇大文章中，淘汰是应有之义，所以我也希望，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在"写"这篇大文章的时候，最好能够就淘汰问题"写"几句话。在前进的过程中，请想一想该淘汰哪些不符合前进规律的东西，想一想如何加以淘汰。要在脑子里为淘汰这个概念留一席地，不要怕它，也不要绕开它，不承认它。客观上有这种现象，主观上就应当有这样的观念。没有精神准备，会吃亏的。

比方说，铁椅子和铁饭碗之类的东西是否能够永存，就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有一种精神准备。铁椅子的好处是牢靠，铁饭碗的好处是砸不烂，惜乎这些铁器太沉重了，不利于行军，更不利于长途兼程行军。驮在背上，不胜负担。老是把它们放下来休息吧，又有很大的引诱力，见椅歇腿，

见碗开胃，千里马也难免恋栈，二十天的路也许得一百天走。所以，这些铁打的东西，恐怕以淘汰掉，换得轻便一点为好。换了以后，可能会容易损坏，不过，也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人们更用心，更谨慎，而不再那么有恃无恐，那么玩忽。能不能照顾这些铁器呢？要说照顾，必须照顾有利于现代化的东西，不能照顾拖现代化后腿的东西。照顾了铁椅子、铁饭碗，会使几亿长征大军都落在人家后边，集体挨打，集体被淘汰。这个亏太大了，谁也吃不起。

谈到淘汰，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似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当有这种现象。殊不知消灭剥削就是对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淘汰。时间在前进。把落在时间后面的东西不断地淘汰掉，正反映着我们的社会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把社会主义当作保险公司，无疑是一种有害的错觉。

不是害怕淘汰吗？很好，那就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前进吧！如果精神上有所准备，大家齐努力，落在时间后面的现象反而会少，淘汰的面反而会小。前面说过，非现代化的东西如果不努力向现代化的方向进行改造，其后果将不免被淘汰。反过来说，如果能够自觉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改造再改造，前途将不可限量。大家都能认识

到前进和淘汰的关系，都知道人间尚有淘汰一事，都知道不能懈怠，不能慢吞吞地走，必须向前赶，自强不息，那就大有希望。可怕的是觉得什么都保了险，高枕无忧，万事大吉。这种思想最害人，使人因循，苟安，不学习，不求革新，不求进取，不承认新长征中有淘汰，正是被淘汰的祸根。

一百年前有一部书，内容已经陈旧了，但书名取得非常之好，叫做《盛世危言》，的确，危言是可以出盛世的。危言淘汰，对于走向现代化的盛世，如果能够稍稍起一点微薄的作用，这篇杂感就达到目的了。

（原载198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意见

我们吃官僚主义的苦头很多，但对官僚主义研究得太少。过去，我们谈官僚主义，主要是着眼于阶级根源。但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如果对官僚主义继续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水平上，就可能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轻描淡写，麻木不仁，因循苟安，认为反正我们的官僚主义跟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在看到官僚主义成堆的时候，又惊慌失措起来，看成是阶级敌人破坏，干部蜕化变质，企图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这次中央提出官僚主义问题，是同制度和体制连在一起的，这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眼界。应该说，官僚主义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大量存在的，它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有关，跟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关，跟我们的干部制度有关，也跟我们的干部构成有关。我们既不要对它掉以轻心，

不以为意，也不要把它当做可怕的东西，一反就惊天动地。只有实际地把这种社会现象放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历史地现实地进行考察，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采取慎重稳妥的政策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才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官僚主义表现形式很多：有干坏事的官僚主义，有想干好事而干了错事的官僚主义，有想干好事而干不成事的官僚主义，还有想干好事而不会干事的官僚主义。干坏事的官僚主义，很恶劣，引起民愤，但毕竟是少数。大量的、普遍的、常见的、在现实中重复多少次的，是干错事的官僚主义，是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欲干不能，欲罢不忍，也是在官僚主义泛滥下的一种变态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不会干事的官僚主义，根本没有知识，也没有本领。除了干坏事的官僚主义之外，后面几种官僚主义恐怕是给我们痛苦最大，损害最大的，因此必须着重研究。

我想应该分析，为什么干了错事不能及时纠正，甚至十几年、二十年不能纠正？为什么无可奈何的现象不能改变？尽管大家都不满意，但总是改不过来？为什么不会干事的人有权干事，而能干事的人却无法干事？这样一分析，就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接触到体制和制度的问题。许多该由下面解决的问题，下面却无权解决，只好矛盾上交。

负责批准的机关，又无法了解那么多的具体情况，不可能正确地解决矛盾。进一步想，又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事事都要请上级批准呢？再进一步想，为什么每一个单位都必须有一个上级呢？毫无疑问，国家机关，应该有上级下级。但是，非国家机关，比方说，工厂，商店，研究所，设计院，剧团，出版社，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上级不可？大概是没有上级就没有经费，没有饭吃。那么，为什么必须由国家包饭，为什么不能自己做饭，为什么不能使许多社会细胞在互相交换自己活动的过程中互相服务，互相养活呢？恐怕将来所有的企业单位和许多事业单位，都需要同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行政部门不要老是把企事业单位抱在怀里，包在襁褓之中，一方面喂他，养他，一方面裹住他的手脚。行政部门累得很，企事业单位又动不了，吃不饱，长不大。要让企事业单位去为全社会服务，由全社会给他报酬。谁服务得好，就长得快，长得壮。谁不能为社会服务，就淘汰。这样，行政部门不背包袱，企事业单位也有责有权有利。上面可以少犯一点办错事的官僚主义，下面也可以少犯一点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上上下下，都解放了。

因此，我想一般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的细胞之间、社会的组织之间是

一种什么关系？是服从、依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如工厂，必须属于某个部，不属于某个部的工厂是没有的。研究所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研究所必须是某个部的研究所，它就不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所？一旦一个部分成两个部，就要讨论研究所是属于你还是属于我，属于你的就不能接受我的任务，属于我的就不能接受你的任务。据说，只有这样，才叫归口。

为什么一个社会组织，科学的也好，生产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总得依附于某个行政部门，才能表示它的社会存在？难道只有这样组织起来的结构，才叫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恐怕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这是列宁以后的变态。这种情况的存在，会阻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考虑社会结构问题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机械的观点，一种是有机的观点。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往往习惯于采取机械的，服从的、依附的观点。如果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细胞、社会组织的关系调整为有机的、互相结合的、互相制约的关系，官僚主义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管，我们只反对官僚主义式的管。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管。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要有管，但这种管，不能苟同于封建社会的

管。封建社会是上级压下级，一级束缚一级。我们应当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凡是一个社会细胞自己能够管的事，就应当由它自己去管，或者叫做民主自治。一个社会细胞内部无法解决的事，又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几个细胞可以商量解决的事，那就联合起来办，或者叫联合起来管。还有联合起来也管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限度内，就需要有高度权威的行政力量来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应当是为大家服务，帮大家解决问题，同封建社会的上级压下级完全不同。当然，自己管，联合管，行政干预，都是管，因此，要看怎么管。管得活，有利事物的正常发展，不叫官僚主义。如果管得死，妨碍事业的发展，当然是官僚主义。我们现在的根本问题是管得太宽，管得太死，管了许多不该管、不能管、也管不了的事，把许多上面解决不了也不可能由上面解决的问题，都弄到上面来解决。在这种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下，要求上面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同志，即便是天才、伟大人物，在这样的体制下，都不可能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一个服从，一个依附，如果在一个小国家里，也许问题不会太大，但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就会出大问题；如果在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国家，也许刚好可以适合它的很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但

是，在我们这里，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样一种体制所产生出来的毛病，造成的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们的眼界不能越出封建社会中的公侯伯子男的观念，我们就会把机械的、服从的、依附的关系当作天经地义。所以，在改革体制过程中，非打破等级观念不可。1951年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安子文同志讲到，干部中等级思想值得注意。我们很多同志是一起出来革命的，回到家乡，人家就问，张三大，还是李四大，他管你，还是你管他。小孩受老师训，小孩就对老师说：我爸爸的警卫员比你还大。这样一种东西，是到了根除的时候了。我不是说这样的问题现在就能彻底解决，而是要彻底考虑这种等级观念究竟正确不正确，光荣不光荣，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还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应该奉行的，还是应该抛弃的。当然，既然它是由一定的社会原因造成的，那么，要改变这些社会原因，就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应该通过制度的改革，为逐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创造条件。

过去马克思说，劳动者应该成为主人。现在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来束缚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我们应该有勇气来面对现实，打破这种作茧自缚。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

盾，叫做正确的路线跟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路线是解放生产力、发挥积极性，而我们的制度却在妨碍积极性，束缚生产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侧面之一，就体现在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上。

（这是作者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1980年10月17日《光明日报》。）

1 9 7 9 年

发明者应当受奖励*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科学技术专家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规定了一系列对创造发明的登记、申报、评选和奖励的制度。

实践证明，这些以法令形式肯定下来的条例，都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促进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到1964年11月止，向国家登记的科学技术新成果有三千多项。

不幸，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一制度被迫中断。他们的倒行逆施，使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甚至发明者受罚，破坏者得奖，严重地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败坏了社会风气。

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不久前，

* 本文是作者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一篇社论。

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农林部、卫生部重新印发了《技术改进奖励条例》。最近，国务院又决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这些发明奖励条例的发布和实行，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又一重大措施。

科学技术工作是极其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发明就是这种劳动的可贵的成果。生产技术上的任何重大变革，都离不开发明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加大，而是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而获得的。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上，我们现在不仅远远落后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而且落后于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其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发明创造太少。给发明者以奖励，使更多更好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断创造出来，有效地运用和推广到生产建设中去，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会起很大促进作用的。

奖励发明的政策，同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样，是以承认差别的存在为前提的。从总体上看，这正是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违反客观规律，不从根本上致力于发展生产，侈谈什么消灭差别，似乎很动听，很“革命”，其实

是荒谬的，反动的，只能玷污社会主义的旗帜，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人所共知的。我们的政策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主观努力大，成绩大，贡献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才能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和其他劳动者向他们学习，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够富裕起来。奖励为人民造福的发明者，归根到底，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是真正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的。

国务院这次发布的发明奖励条例，总结了过去奖励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集体发明，所得奖金按照发明者贡献大小，合理分配；个人发明，所得奖金发给个人。这就是说，不仅应当坚决地奖励发明，而且应当坚决克服授奖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把个人发明申报为集体发明，是错误的。对集体发明，不区别有无贡献和贡献大小，平均分奖，达不到鼓励先进的目的，失去了奖励发明的意义，也是错误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明属于国家所有。全国各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利用它所必需的发明。发明的申报、评定和奖励，是极其

严肃的工作，必须采取实是求事的科学态度。对垄断发明，压制发明，弄虚作假，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等资产阶级的恶劣行为，轻则应当批评教育，重则应当给以处分，直至依法惩办。总之，要是非分明，赏罚分明。这样，就一定能够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原载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

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

我们过去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跌过一些跤。有些错误，一犯再犯。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做这些工作时，不尊重客观规律，违反科学，甚至违反了常识。

犯错误，违反客观规律，当然同我们知识不足有关。但问题不仅在于这里。问题还在于我们对有知识的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创造条件，使各方面的专家和内行都得以施展所长，很多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知识是力量，不是罪恶；“知低德便高，专多红就少”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持疑惧态度，不是工人阶级应有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它反映了旧社会中那些遭受压

迫但还没有充分觉悟的小生产者的心理。他们被剥夺了学习知识的条件，本能地把知识看成是自己无法支配的异己力量。他们受狭隘的眼界所束缚，不懂得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的革命作用。对旧世界，他们有反抗的要求，但是不了解：在破坏旧世界的时候，不应该把人类的知识宝库抛弃掉，在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处处要依靠知识的力量。小生产者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事实上，在党的教育下，小生产者出身的不少同志克服了这种错误观点，勤奋好学，孜孜求知。但是，也确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脱出这种蒙昧状态。在他们看来，仿佛“知低德便高，专多红就少”。应该指出，以无知为荣，以外行自诩，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并不是罕见的。

“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队伍中的这些错误思想，把它推向极端，挥舞起那根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棍子，对知识进行毁灭性的围剿。

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相当数量是自由职业者，他们都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占很少的数量。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

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知识分子的："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43页）

马克思又说："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五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五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32页）

马克思是严格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来

使用“生产劳动者”这个概念的。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者”，是指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在上一段引文中所说的“生产工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142页)

马克思对教员、演员、作家、歌女所作的这些分析，无疑也适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其他活动的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等等。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三种知识分子，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阶级。

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企业老板等等中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属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之所以属于资本家阶级，丝毫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而因为他们是老板，因为他们占有资本，因为他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此外，还有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代理人，也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被资本家雇佣的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不管他们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例如工程师），还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例如教员），他们都和受雇于资本家的体力劳动者一样，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

一种是自行开业的医生，自行设馆的教师，自行研究的发明家，自由投稿的作家，自行演出的

艺术家等等。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独立从事劳动的体力劳动者相同，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不受雇于人，不为老板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不是工人。但是他们并不雇佣工人，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

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知识分子中，大量的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自由职业者也有相当数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占很少数。

因此，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笼统地归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范畴，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把他们说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错误的。

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笼统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更是不正确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大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全国解放以前，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社会活动岗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他们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为自己的职业的。显然，他们早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了。

二、在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工农分子中，许多同志已经知识化了。他们拥有丰富的甚至非常渊博的知识，常常使一般的知识分子为之心折。毫无疑问，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我国工人阶级中最早实现知识化的先驱。

三、旧社会中受雇于私人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以及外国资本家的知识分子。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先后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职工。他们在资本家的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的时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难道在资本家的企业被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之后，他们反倒从生产工人变成"资产阶级"了吗？应该肯定，他们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不是资本家，而是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

四、旧社会中的自由职业者，解放以后，也陆续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中间的上层，生活比较富裕，即使如此，也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中间的下层，则同上面说的第三部分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非常接近，甚至很难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来。实际情况常常是这样的：找到职业，就成为受雇于学校老板的工人，一旦解雇，则成为教家馆的私

人教员；有时是受雇于书店老板的编辑，有时（或同时）则又是自由撰稿的作家；如此等等。进入新社会后，在二三十年的长过程中，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直执行着国家所分配的任务，过着工资劳动者的生活。今天，他们都是至少有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五、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数量很少的一部分，按照他们当时的经济地位，确实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他们是以占有剩余价值为生的。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们接受了党和国家的和平改造政策，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的阶级地位起了变化。他们有继续改造世界观的任务，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其他的工人高，但是，这些并不是划分阶级成分的根据。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他们同其他的工人一样，为社会主义企业劳动，并向社会主义企业领取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工资。过去，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是资本家，这是事实。今天，他们已经开始站到工人的行列中来了，是在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了，这也是事实。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这种根本的变化，帮助他们认识到由于这个变化而肩负的责任。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党曾经肯定了地主分子在土地改革后改变阶级成

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据此规定了相应的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才认真加以实施。人的阶级成分，同其他的事物一样，都是可以变化的。对于原来属于资本家成分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应当采取这种承认变化、承认发展的观点，正确地对待他们。老是把他们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的。

六、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我们党的教育下，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这一部分人数最多，而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他们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大。能够把这些同志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吗？如果允许那样做，简直是对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教育工作、社会教育工作以至全盘革命工作的嘲弄。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除台湾外）消灭了剥削阶级。难道我们党在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下，在自己建立的教育体系中，反倒培养出了成千成万的资产阶级！诚然，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是，即使是他们的家庭，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至于这些同志本人，那么，从他们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只要丢掉反动的血统论和封建的世袭观念，这

个问题是不难分辨清楚的。还需要指出，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是工人阶级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骨肉。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依附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继承和实现自己父兄未竟的事业。党号召大家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们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其他成员相比，唯一的特点只是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硬把掌握了知识的工人说成不是工人，硬拿资产阶级的帽子往他们头上扣，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主要由以上六部分人组成。其中，只有人数极少的第五部分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不少人早已参加了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从他们的现实经济地位来说，也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劳动者了，而不再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了。除此之外，其他五个部分人，都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中间，有的是为在中国消灭剥削制度而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的战士，有的是在旧社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饱受资本家剥削痛苦的老工人，有的是在旧社会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终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脑力劳动者，有的是新社会自己培养出来并且吸收到工人阶级队伍

中来的新的一代。由此可见，只要严格地遵循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就应该如实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确实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他们推到资产阶级那边去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应该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能不能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呢？

马克思说得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同样，不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创造了各个不同阶级，而是各个不同的阶级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应当用世界观的状况来解释阶级的状况，而应当用阶级状况来解释世界观的状况。拿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叫做本末倒置，本身就是违反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

划分阶级的依据，只能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剥削关系。这是唯一合乎科学的依据。搞过土改的同志都知道，我们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时，就是这样做的，谁是地主、富农，谁是富裕中农、中农，谁是贫农、雇农，都是根据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剥

削被剥削的关系决定的。党中央有明确的政策界限，不仅有质的规定，而且有量的规定。土改工作队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如果在土地改革中拿谁是什么世界观去决定谁是哪个阶级，岂不天下大乱！如果在土地革命时期那样做，我们的红色根据地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如果在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大片解放区都得丢光，哪里还谈得上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也许，脑力劳动者的情况有点特殊，不能用经济地位而必须用世界观去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

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脑力劳动者，对他们无法进行阶级分析。

正是马克思本人，在解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时，透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前面已经引用的马克思对教员、作家等脑力劳动者所作的分析以外，让我们再引一段马克思专门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论述。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

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44页)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丝毫不妨碍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下的阶级关系作出分析。一个人，只要在对资本的关系这个特定意义上，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那么，不管他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都是受资本家剥削的生产工人。只要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应当承认这个科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应当承认对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一样，是应当并且可以进行这种分析的。

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会反映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它会反映到工人阶级的脑力劳动者身上，也会反映到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者身上，还会反映到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

在着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根绝这种现象。对于这种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毫无疑问，应当向他们提出批评，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的工人阶级成分。

如果用世界观作为划阶级的依据，工人阶级中有的人就会被划到小资产阶级那里去，有的人就会被划到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那里去，岂不把一个阶级划得四分五裂。如果那样去做，阶级都不成其为阶级了，还算什么阶级分析？

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写《道德经》的老子到底是什么世界观，众说纷纭，两千年定不下案来。按世界观划阶级，根本是行不通的。其实，所谓按世界观划阶级，只是不顾经济地位的事实，乱扣资产阶级的帽子。林彪、“四人帮”十年反革命大破坏中，不仅对知识分子以世界观划阶级，而且以世界观定罪，教训太深刻了，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方说，定罪必须依法，这是一条。定阶级必须看经济地位，这也是一条。

否定以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世界观问题的重要性。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丝毫

不意味着从此就不必改造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包括其中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大家都要改造，这种改造，同对异己阶级的改造是性质根本不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我们大家都应当在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认真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同心同德，使我们办的事情更符合客观规律一些，把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一些。

是勉勉强强凑到工人阶级里来的一部分吗？

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赞同。

能不能说，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

恐怕现在还不能作这样的估计。

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一说依靠工人群众，为工人服务，向工人学习，大家

都认识到这是天经地义；但是，一接触具体问题，往往不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比如，办研究所要依靠科学家，办大学要依靠教授，外行应当尊重内行，内行应当有职有权有责，决策应当由有关专家参加研究制订，后勤工作也要全心全意为知识分子服务，文艺也应当努力表现我们的知识分子，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有些同志就不以为然，至少觉得有点理不直气不壮。这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愿或不敢据以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

按照这些同志的观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似乎并不是合格的一部分，似乎是勉勉强强凑进来的一部分，似乎这一部分，既不处在头部，也不处在躯干上，只是一条可有可无的尾巴。

所以出现这种观点，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长期流传着一种错觉，似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后来，"四人帮"把新社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也弄到这个范畴里去了，变成凡知皆资，影响很深。有些同志虽然接受了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状况所作的正确估计，但仅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刚

刚改造过来”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即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老早就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了。为了澄清这种糊涂观念，需要提倡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另一个原因：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缺乏认识。这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科学家、管理家、教育家、文艺家等等，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中走在前面的人。

列宁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列宁全集》第4卷第246页）

什么是“知识水平最高的工人部分”呢？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吗？

列宁又说：

“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列宁全集》第4卷第256页）

在这里，列宁使用了非常肯定的语气，因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先进分子和领袖，总是同远见卓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远见卓识，总是和最有知识分不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最有知识的人，无一例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举世公认，固不待言。就是象狄慈根、倍倍尔，虽然自幼失学，年青时就当了工人，但是，学识的广博，思虑的精密，也是他们的同时代人所称道的。

毫无问题，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是无产阶级队伍的精华。那么，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发明家的作用又应该怎么估计呢？

大家都知道，按照唯物史观，工人阶级之所以是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所以能够在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有科学的依据的。这个依据，就在于它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而从当代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情况来看，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主要来源，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按照国外的统计资料，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由于采用新技术，有的生产部门甚至达到了百分之百。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

有科学技术革命，就根本不会出现现代化大生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中的最活跃的因素。而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技术员等科学技术人员，正是同新生产力中的这个最活跃部分直接联系着的。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不仅代表着现有的先进生产力，而且创造着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力，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最活跃的部分。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知识比较丰富，由于对生产的全局和各工序的联系比较了解，生产企业中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在维护生产系统的权威方面，在遵守工艺规程和操作守则方面，往往自觉性更高，要求更严。

在考察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上，人们常常比较侧重地注意到阶级斗争的革命作用。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看到这一方面，那是很不够的。马克思本人就经常把生产关系的革命和生产力的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结合起来考察。他说过："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111页）在论述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时，他还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起了比当时法国革命领导人更为重大的作用。的确，对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作用，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同样，

对工人阶级中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作用，也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当然还包括其他各行各业的专门家。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专长和重要作用，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决不是工人阶级中的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工人阶级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发明家、企业管理家、教育家、文艺家等等，如同工人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一样，都是我们工人阶级在各自的领域里走在前面的人。

（原载1979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由童大林、吴明瑜和作者共同署名。）

1 9 7 8 年

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

我们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深感这个地区的建设方针有通盘考虑的必要。

（一）

这个地区，有一百二十三个县，分别属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六个省、区，面积约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千四百多万。目前以农为主，但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七十斤，相当一部分地方每亩只产三十斤、四十斤、五十斤粮食。农民的口粮标准和收入水平都很低。据一百二十一个县的统计，每人平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有四十五个县，占百分之三十七；按每人平均收入在五十元以下的，有六十九个县，占百分之五十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的生产水平和

群众生活水平，至今还低于解放初期或抗日战争时期。如宁夏的固原县，过去被称为粮仓、油盆和畜牧基地。1949年每人平均产粮八百二十斤，1977年下降到三百八十斤。1956年交售食用油八百六十多万斤，1976年下降为八十多万斤。1958年交售三千多头牛，1977年下降为八百多头。这个县，1977年群众口粮只二百多斤，平均每人收入只二十九元。延安的柳林二乡，曾经是陕甘宁边区三个模范乡之一，1943年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四百多斤，1977年下降为五百多斤。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所在的原川口六乡，七大代表申长林所在的潘龙二乡，情况也都类似。

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是茂密的林区和肥沃的草原，现在自然条件变得这样坏，根本原因是违反自然规律，滥开耕地，破坏了林区和草原，破坏了植被和生态条件。由此产生了三个严重的恶果：

第一个恶果是破坏了当地的林业和牧业。上面说的固原县就是一例。这个县从解放以来，耕地面积扩大了一百二十三万亩，粮食总产量只增加了二千万斤。而林区面积却缩小了百分之二十，有十三个公社已经没有草场。

第二个恶果是破坏了当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开梢林为耕地，两三年内还可以亩产二三百斤粮食，几年以后就降到一百斤以下。本来，

依托林草，农业生产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由于林草面积日蹙，引起沙漠南移，雨量稀少，气候无常，霜期多变，已很难选择适宜在当地稳定生产的作物和品种。本来，有林有草，生态条件较好，搞工程措施也可以事半功倍。现在大量水土流失，往往一场暴雨，就毁田决堤，不可收拾。一般的农田基本建设经常是年年搞，年年垮，再年年修，投入大量的劳力和资金，而收效很小。

第三个恶果是严重威胁黄河下游的安全。据统计，每年流经三门峡的泥沙，解放初期约十三亿吨，目前已增加到十六亿吨。如果把这些泥沙垒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堤，可以绕地球二十三圈半。而在这十六亿吨泥沙中，约有十一亿，即百分之七十，来自黄土丘陵沟壑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冲刷量，每年平均达到四五千吨左右。

有两个数据颇能形象地说明问题：

一、据历史记载，从秦朝到解放前，二千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较大的决堤有九百七十三次，但从王莽到隋初的五百八十年中只有两次。那时，这个地区以游牧为主，农田不多，黄河下游的事情就好办得多。

二、据西北水土保持所1973年测定，在总降雨量三百四十六毫米的条件下，林地的冲刷量每

亩仅四公斤，草地仅六点二公斤，而农地则为二百三十八公斤，农闲地为四百五十公斤。农地和农闲地的冲刷量，相当于林地和草地的几十倍以至一百多倍。

陕北米脂县高西沟大队的实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大队，1958年前，不搞林，不搞牧，光种三千多亩地，每亩收粮食不到三十斤，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保证不了。二十年来，逐步退耕。现在，林牧业发展起来了。每个牧业劳动力的年产值达到一千一百四十元；每个林业劳动力的年产值也达到了九百一十七元。农业是不是下去了呢？不仅没有下去，而且显著上升了。二十年间，粮田面积虽然从三千一百亩退到了一千零五十亩，但总产量却从八万斤上升到五十六万斤。他们在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了一千多亩林，一千多亩草，基本上控制了这个地区的水土流失。今年七八月间，连降暴雨，总雨量达三百毫米，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雨量，延安地区和米脂县大约三分之二的堤坝被冲垮，许多农田被毁。跟高西沟毗邻的白坬大队，用三年时间、一万个工、两千元钱修的一块三十亩基本农田，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但高西沟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却安然无恙。9月间，我们组织了几位同志到这个大队去了解情况，看到米脂县许多水库成了“泥库”，有

些桥梁被泥淤住了，有些公路也被冲断了。但是，一进入高西沟大队，就见到了清莹莹的流水。这里确实基本上做到了“不向黄河送泥沙”。

（二）

最近，我们邀集了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座谈。总的意见是：从长远来说，这个地区不宜于以农为主，而宜于以牧为主，或以林牧为主。治好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有可能的，治好黄河也是有可能的，根本的出路在于退耕还牧，退耕还林。抓住了林牧，农田基本建设才好办，农业才好办。在这个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

中国科学院支农办公室石山同志1973年以来曾多次到这个地区进行调查。他说，这个地区虽然缺乏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但很适合于苜蓿、草木樨、沙打旺等优质牧草的生长。苜蓿历来是秦川牛和关中马的主要饲料。当地不少群众有种牧草的经验，也知道种牧草的好处。但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划入牧区，国家不征购牧产品，也不供应粮食，无法退耕还牧。种草，每亩只要两斤种子，几个工就行了，不需要多少投资。一亩草，至少可以养一头大滩羊，或四五十只兔，也可以养牛喂猪，经济价值远远超过一般低产农田的收益。第一年可以同粮食一起种下去，不影响粮食

收成，第三年就进入盛产期，八年始衰，再种。只是第二年困难些。他建议这个地区的粮食低产地和荒山荒地都可以种上牧草，也可考虑用飞机撒播。我们认为，他的建议很有见地。

关于退耕还林和退耕还牧的条件问题，座谈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应当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为前提，在每人平均建成两三亩基本农田、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达到八百斤至一千斤的条件下，才能在陡坡地和远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如果粮食不能自给，群众口粮和国家的粮食生产任务没有切实保证，就无法发展林牧业。

另一种意见是，在分别查明宜林、宜牧、宜农的区域以后，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宜林而未林、宜牧而未牧的耕地退出来。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会有大风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利，不会出大乱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无法解决的口粮问题，不能成为我们办现代化农业，合理利用土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对国家，对群众，对当地，对下游地区，都是有利的事。从暂时看，可能少得几十亿斤粮食（搞得好，也有可能并不少得粮食），但多得的是几十亿斤肉和其他的林牧产品。从长

远看，则不仅可以得到更加丰足的林牧产品，而且可以稳定地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得到一条不再为害的黄河。这个地区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的根源就在于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环境，如果要等粮食搞上去以后，再着手解决植被和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只能是因循拖延。

以上两种意见，我们赞成后一种意见。

我们有几点具体建议：

一、对这个地区的农林牧资源的调查，多年来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需要迅速集中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和必要的补充调查，以便及早定出有科学根据的区域规划。

二、在一些看得比较清楚、把握较大的地方（比如宁夏的盐池、固原，陕西的米脂，甘肃的镇原等），建立农林牧综合发展的基地，并进一步研究在这个地区实行农林牧现代化的具体措施。

三、对已经查明的宜林或宜牧的地区，实行支持和鼓励发展林牧生产的政策。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前提下，允许生产队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同时，积极设置为林牧业服务的各种经济组织；允许生产队向国家交售林牧产品；对完成林牧产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保证社员口粮水平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对超额完成林牧产品交售任务的生产队，同超额完成农产品交售任务的

生产队一样，实行奖励。

四、组织有关省、地、县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大力开展林牧业现代化的研究。发动科学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就这一地区的建设方针在报刊上展开讨论。

（原载197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由童大林和作者共同署名。）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几点看法

今年8月间，我们几个同志到黑龙江省，在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绥化等地区，邀请一些同志座谈农业现代化问题。在友谊农场，遇到美国朋友韩丁，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一路上接触到的，主要是五个问题。

一、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我国三亿农业劳动力，每人每年生产粮食近二千斤。黑龙江省较高，有四五千斤。韩丁每年劳动一百五十天，生产玉米一百五十万斤，每天生产一万斤。我国和美国情况不同。上述数字中，也包括了不可比的因素在内。但差距如此之大，是发人深思的。

在座谈中，许多同志说，农业现代化问题，主要是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是把农业劳动力大

量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劳动生产率是反映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指标。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

有些地方，二十多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例如，黑龙江青冈县从1949年到现在，粮食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则增加了一倍。

我们到1985年要生产八千亿斤粮食，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农业劳动力就必须从三亿增加到四亿。如果保持现有的农业劳动力总数不变，劳动生产率就至少必须提高三分之一，低于这个幅度，势必追加农业劳动力。因此，必须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幅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打个比方说，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从二千斤提高到四千斤，农业劳动力就可以从三亿减到二亿，抽出一亿人干别的。显然，今后农业生产的提高，原则上应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借口劳动力多，不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观点，是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粗略估算，如果我们的水稻、小麦、玉米的单产都能够达到目前世界的最先进国家的水平，即使种植面积不变，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可以达到九千亿斤。因此，提高单产十分重要。而单产和

工效，正是构成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无非是要求：一、每个劳动力种更多的土地；二、每亩地出更多的产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高工效决不能以牺牲单产为前提。提高单产也决不能以牺牲工效为前提。精耕细作同手工操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在友谊农场看了从美国进口的播种机，八小时能播一千二百亩玉米，开沟、点种、施肥、下药、覆盖、镇压，一次完成，行距、株距、深度都好，下种量的精确度也很高。无论在速度上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手工操作。相形之下，反倒手工劳动成了粗放耕作，现代化才是更高级的精耕细作。在小生产的条件下，工效和质量确实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装备面前，手工作业是可以用更准确的机械作业来取代的。搞农业现代化的目的之一，正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把单产和工效对立起来，把精耕细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立起来，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观点，不符合现代化生产的情况。

我们现在同发达国家在农业上的差距，不是几倍，甚至不是几十倍，而是几百倍。不抓住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点急起直追，赶超是无从谈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把劳动生产率问题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农林牧副渔各业的

劳动生产率，都要一年比一年高。农村中各项工作，如科学种田，农业机械化，以及社队经营管理等等，都要着眼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最近从美国引进了六十台农业机具。韩丁说，这些机器基本上可以代表美国七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比他自己使用的机器先进。他建议二队同他竞赛，比一比劳动生产率。现在这套机器由二十人操作，种两万亩地。其实有十五人就够了，可以种三四万亩地。如果再加上采用良种，普遍使用灭草剂，实行更合理的种植制度，大力改进经营管理等等，那么，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很快就可以赶上和超过韩丁。

从上面这个例子来看，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办现代化农业，同办现代化工业一样，要舍得花必要的本钱。黑龙江省的自然条件，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仓，可以考虑，先在黑龙江建设这样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样板。

二、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狠抓机械化，当务之急，是农机配套

在座谈中，大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狠抓机械化。同过去比，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机器，但是，为什么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提

高？为什么劳动力不能相应地解放出来？主要原因之一是机器不配套，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没有播种机、中耕机、收割机，有了拖拉机，也干不了多少农活，只能跑运输。黑龙江不少群众把拖拉机叫做“犁后喘”，因为这些拖拉机没有配套农具，只好挂上犁杖，由人扶犁，拖拉机在前面开，人在犁后喘。机械化投资来之不易。一台拖拉机就要花一二万元。但机具不配套，发挥不了作用，群众意见很大。

从黑龙江的情况看，当务之急，是农机配套。这样做，见效快。绥化县积极发展经过群众革新的深松播种机，松土、破茬、点种、培垄、镇压，五道工序一次完，深得群众欢迎。他们播种和中耕的机械化程度已达百分之七八十。全县十三万农业劳动力，有五万人已初步解放出来，参加了社队企业和植树造林、养猪积肥、农田基本建设等专业队。他们有一个规划，打算把其他田间作业和非田间作业的机具尽快配成套。

搞农业机械配套，在黑龙江，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成问题，省、地、县可以设法解决。问题是缺资金和材料。特别是缺方钢之类的合格钢材，省内无法解决。我们认为，唯其资金和材料

缺乏，需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散使用，到处撒胡椒面，到处都配不成套。如果选择一些机械化基础较好的地区，集中使用投资，帮助他们迅速配套成龙，收效可能更快，更显著。

搞好配套，可以大大提高工效，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产量。比如，黑龙江无霜期短，及时播种就特别要紧。绥化县过去春播要一个多月，现在十几天可以播完，有的公社几天就可以播完。这就等于为作物延长了二十天到三十天的生长期。再如，从美国进口的播种机，镇压器的保墒效果很好，播后出苗齐全。这种镇压器，结构简单，如果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播种机上，对春旱地区就是一项简易而重大的增产措施。

因此，配套也要提高质量，也要赶超。我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作物种类繁多。看来，从不同的发达国家，多引进一些适合各种条件的先进的农用机具，作为研究和生产的借鉴，是很有好处的。

黑龙江地多人少，三铲三耥，十分紧张，稍一耽误，就成草荒。友谊农场使用进口的灭草剂，效果比锄草好。我们去看了，地里非常干净。成本也比锄草低。除草，是以机械锄草为主，还是化学灭草为主，尚可研究。但从长远看，化学灭草必须及早上马，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建立一系列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和社会结构的改变问题

谈到韩丁的劳动生产率时，大家都认为，这种劳动生产率，不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的。韩丁不仅有七台机器，而且有许多社会机构在为他服务。韩丁自已也说，农业是美国最大的工业，一系列的企业都是为农业服务的。要良种，找种子公司。不管要哪种化肥，化肥公司都能迅速供应。去年韩丁的烘干机坏了，第一天下午向一千多里以外打电话，第二天就收到了空运来的零件。他要了解土壤成分，就找三十里外的大学帮他分析。他技术上有困难，县里的农业科可以提供咨询。农民要盖房子，挖沟渠，运粮食，运牲畜，运饲料，都可以找有关的企业承包。没有这些条件，即使有了土地，有了机器，生产过程也得中断。这些当然不是资本家对农民的“福利”，而是垄断资本的触角已经伸到四面八方，把个体农民紧紧地囊括和控制到自已的手中去了。韩丁这样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个体农民，实质上，他们已成为被许多资本家共同使用的“厂外工人”了。

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了把分散的个体农户抓到自已手中，尚且同农业建立了如此密切的

联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的工业和各行各业应该如何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呢？

生产的现代化，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要求改变自给自足的社会生产结构，要求城乡之间、各专业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建立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农业现代化需要全党全国的重视，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援，特别是城市的支援，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支援，科学和教育的支援。看来，在大城市和大工业中心的周围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应该更快一些。拿黑龙江省来说，在哈尔滨和大庆之间的地区，可能将是首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地区。

国务院已经决定建立各级种子公司。这是一个重大的措施。黑龙江的青冈县是全国八个试点县之一。我们找了一些同志座谈。初步看，办好种子公司，恐怕至少要注意这样四点：一、要同科学研究机构挂钩，把做买卖同推广科研成果结合起来。很可能将来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不是依靠行政的办法，而是主要依靠科普教育和专业公司这两个渠道。二、要有好的装备。一定要把比较先进的烘干机、精选机、储藏手段、测试手段和必要的运输手段配备起来。否则，如果在精选、储藏等环节上出了问题，影响就太大了。

三、要按照经济规律，用做经济工作的方法办事。要有计划，讲核算，订合同，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提高工作效率。要使社队看到专业公司对它们的服务真正是有益的和有效的。如果本县的公司不能为社队提供良好的服务。可否允许社队向外县的公司订购呢？恐怕是应该允许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是你需要什么我供应什么，而是我卖给你什么你就得要什么，这种办法，对农业不利，对公司提高管理水平也毫无帮助。四、配备人员，要多配科技人员和营业人员，少配行政人员。总之，要讲科学、讲技术、讲做买卖，讲效率，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不能把种子公司办成为只换一块招牌的行政机构。

将来各种专业的支农公司会越来越多，种子公司只是其中的一个。办好种子公司，对于如何办其他各种专业公司，如何提高支农的质量和效率，是会有参考作用的。

加强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如何统筹安排，如何建立大中小城镇的各种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如何试办例如南斯拉夫的那种农产品加工的联合企业，整个经济结构将会起什么样的变化，等等，都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四、剪刀差问题

黑龙江省通过揭批"四人帮",改进干部作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群众情绪高涨。

看来，经济政策方面，继按劳分配之后，缩小剪刀差势在必行。这是一件关系到广大农民收入、资金积累和提高农民积极性的大事。下面是几个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

一个是拖拉机的油料费用和维修费用。我们所到的县，每台拖拉机每年花在这两项的费用，一般都在一万元以上，有的达一万五千元。即以一万元计算，按照黑龙江的情况，就相当于四百亩土地上全部粮豆产品的收购价格!

再一个是化肥。大庆卧里屯化肥厂投产后，黑龙江全省每亩地可增加供应尿素十斤，本来是好事，但农民不愿买。据省供销社反映，卧里屯生产成本每吨约一百五十元，加上工业利润二百元，出厂价格为三百五十元。商业环节中，从进到销，又加了一百元（其中，运输、损耗和资金利息约四十六元，管理费十八元，上缴总社十九元，省内利润十六元），供销社的出社价格就成为四百五十元。一斤化肥以增产四斤玉米计，农民购买一斤化肥，就花了三斤到三斤半玉米钱。他们买十斤化肥，花了人工，上到一亩地里，虽说

增加了四十斤产量，但只能增加相当于五斤到十斤粮食的收入。

许多支农产品是小工业生产的，同大工厂的产品比，质次价高。大工厂生产的500标号水泥，出厂价格每吨五十八元，但农村买不到。农村能买到的，是100标号的劣质水泥，出厂价格高达每吨一百二十元。再以农机零件中的“标准件”为例，有一种产品大厂八分钱一件，买不到，能买到的是小厂产品，一元二角一件。

不仅工业品和农业品的比价不合理，农产品内部的各种比价也不合理。有人计算，喂肥一头牛要一万四千斤草，草价每斤三分八厘，合五百三十多元。而一头肉牛的收购价格不到三百元。他们说，牛比草贱，谁还养牛呢！养羊，也有同样的问题。活羊的收购价格每斤一角九分，只合五斤草钱！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不解决是肯定不行的。

五、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问题

现在，农业科研工作和农业教育工作极其薄弱，应当大力加强。

省委现在的工作重点在农业。省科委的工作也应当以农业科研为重点，并组织其他各方面的

科研工作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农业服务。看来，黑龙江如果要建设成为大粮仓，不仅要拥有强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各种支农企业，同时要建立一系列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完整的农业教育体系。当前，首先必须把现有的农业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开展具有本省特点的农业科研工作。地、县两级的农业科研工作，课题雷同，重复太多，“上下一般粗，左右皆弟兄”，需要在全省范围内，根据各地各县的具体情况，统一安排，各有重点，分工协作。

农业教育工作也亟待加强。黑龙江农学院的前身是东北农学院，基础很好，这些年被折腾得不成样子。美国能建立高度现代化的农业，同他们重视农业教育是分不开的。看来，各省应该把自己的农业大学办好，并且大量发展农业中专。配备师资，购置设备，要优先考虑农业大学的需要。那种只重视综合大学和理工科大学而轻视农业大学的观点，必须纠正。

长期以来，在县、社两级的农业技术人员中，几乎谈不上什么技术责任制。他们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现在各行各业的科技人员，都在恢复技术职称，建立技术责任制。农业方面怎么办，特别是在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中如何建立技术责任制，似需进行研究，把这个多年没有解决

的问题切实解决一下。

一路上，还听到反映："科学种田，越种越累，越种越贵。"这是对我们过去某些做法的批评。真正搞科学种田，群众是十分欢迎的。问题是一些并不科学的东西，有时也在"科学种田"的名义下流传。比如一亩地要上几万斤土杂肥之类，其肥效往往只等于几百斤秸秆还田，而费工则不可以道里计。黄土搬家，往往还把大量草籽以至碱土弄到地里，不仅徒劳，而且有害。有的地方要求倾斜度在五度以上的坡地都改成梯田，到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也很值得研究。

在农业科技人员中，很需要大大发扬讲究实效、讲究高效的工作作风。我们的农业，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作物种植制度、土地耕作制度和积肥施肥制度，其中合理的因素应该继承发扬，落后的成分应该逐步淘汰。对各种技术措施，不管是传统的或者新兴的，都应该从经济效果方面进行研究。对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一切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应该鼓励他们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开展农业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

（原载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由童大林和作者共同署名。）

日新月异和标新立异

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人们渴望得到日新月异的果实，但是害怕标新立异的主张和人物。日新月异吗，很好很好。标新立异呢，不妥不妥。

日新月异，指的是高速度，大发展。科学技术应当如此，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应当如此。标新立异，就是解放思想，求发展，求变革，敢进取，敢创造。历来的开拓者，创造者，革命的巨人，科学的先驱，没有一个不标新立异的。要做到这一点，看来容易，其实很难，很艰苦。既不能靠人云亦云，吃现成饭，也不能靠灵机一动，心血来潮。硬是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可惜，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不知压抑和扼杀了多少求新求异的人物。影响所及，使许多人把墨守成规当作美德，把标新立异看成罪过。张

三说李四标新立异，本意大抵不在表扬。李四听了，如不申辩其无，即当检讨其有。认为是赞许而受到鼓舞，是优点而加以发扬的人，也有，恐怕不多。

视标新立异为洪水，为猛兽，由来已经很久很久了。剪辫子人言啧啧，留胡子物议喻喻，鲁迅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愤怒地揭露过这类因袭的重负。人是要有一点创造精神的。前人不标新，无以至今日。今人不立异，不会有将来。如果一定得恪守列祖列宗的家法，远的姑且不说，只要上溯一百年，男子就得蓄辫，妇女还要缠脚，学生只能读经，天子上朝，山呼万岁，老爷升堂，鸦雀无声，民主革命都无从谈起，哪里还有今天的社会主义！

有一种议论：标新立异，在过去是好的，在今天就不好了。或者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还马马虎虎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就大逆不道了。为什么？据说是怕有损于我们的理论和制度。

持这种议论的同志，未必不是好心。但是，他们心目中所怕受损的，一定不是我们的生机蓬勃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反，一定是某种僵死的停滞的东西，例如杜林的模式和林彪、“四人帮”的顶峰之类。如其不然，何必怕发展，怕变革！杞人忧天，怕天塌下来，大概以为天是一

块板，但天毕竟不是板，所以也终于无损于天。杞人的病，一是虚弱，一是无知。

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凡是革命的制度，合乎科学的道理，其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在于它们是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定模式，立顶峰，划禁区，搞僵化，诸如此类的死气沉沉的手段，用来保护反革命反科学的东西，也许可以奏效于一时。如果用来对待革命和科学，那就只能葬送革命，窒息科学。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不能靠喊口号和表忠诚，那种东西，低级得很，危险得很。真正靠得住的，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是这样做的，党中央也正在领导我们这样做。

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实现四个现代化了。真的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为重，就必须搞好四个现代化。标新长征之新，立现代化之异，恐怕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舆论和风气。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要实行。不利的，要革除。官僚主义，要反对。小生产的那一套，要去掉。无人负责，吃大锅饭，要改过来。废话之类的喧嚣，要休息。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本领，要掌握。没有标新立异的人，办不成日新月异的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最

需要的人才，恐怕就是敢于和善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无所畏惧，立志改革的人才。这样的先进分子越多，我们的事业才越有希望。

（原载1978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时由张晓彬与作者共同署名。）

1964年

明辨是非的两个基本条件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笔记

同样一件事情，有人认为“好得很”，就一定有人出来反对，说：“糟得很”。

1926年到1927年，对在湖南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就有这样两派截然对立的议论。毛泽东同志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他又说：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

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场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斗争着的双方，对这一斗争的看法全然相反。一方是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当然认定自己的斗争是好得很。另一方是靠压迫和剥削农民吃饭的地主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国民党右派，以及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层以上社会，当然齐声咒骂农民运动"糟得很"。这个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可是，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间，也居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呢？那些跟着地主阶级瞎说的"很革命""很进步"的人，究竟因为缺少些什么东西，致使他们弄混了是非的界限呢？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满城风雨的错误舆论压力的革命派，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把是非界限划得一清二楚呢？

毛泽东同志在提到全力支持农民运动的革命派时，指出了两个特征。第一，他们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不是没有坚定的革命观点的人，更不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假革命者。第二，他们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而不是光靠"闭眼一想"就妄加判断的人，也不是对农民运动一知半解若明若暗的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一要确定革命观点，站隐阶级立场；二要走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这是明辨是非的两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阶级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思想感情不同，是非标准也必然不同。划不清阶级界限，是非就无从谈起。从革命观点出发和从反革命观点出发，固然一定会得出全然相反的结论；有坚定的彻底的革命观点的人，和还没有树立坚定的彻底的革命观点的人，也常常会有不同的或者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凡事都要问一问“对哪个阶级有利”。他们听到敌人骂得越起劲，就越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路子是走对了，就越加坚定地朝前走。还没有树立坚定的彻底的革命观点的人，在坚强的领导下和通常的情况下，也许一般地能够识别是非，但是，如果遇到大风大浪，听到舆论大哗，如果要他独立地作出判断，那就可能气馁，可能动摇，模糊了是非界限，甚至会成了敌人的应声虫。

所以，确定革命观点，站稳阶级立场，是明辨是非的第一个基本的条件。

光有革命观点，不走到群众中去了解某一事物的实际情况，还不足以作出对这一事物的正确判断。阶级分析，就是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实际的事物。不占有具体的材料，阶级分析就是空的。

我们说，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就是好得很，对革命有害的事情就是糟得很，这是一个原则。可是，一件事情，到底对革命有利还是有害，为什么有利或者有害，有多大的利或者多大的害，这不能靠“想当然”，而要仔细的听取工农群众的反映，认真地考察实际工作的效果。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明辨是非，是要明辨具体的是非。抛开了具体的事物，还有什么是非说得清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不朽的文献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的产物，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革命观点来分析大量的实际材料的结果。我们学习这篇报告，不仅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报告中作出的具体结论，尤其要学习毛泽东同志这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用革命观点来分析具体材料的精神。

确定革命观点和了解实际情况，是相辅相成的。革命观点越坚定，越彻底，就可以指导我们把现象的本质看得越清楚。另一方面，如果真正能够深入下去向群众求教，向实际求教，也会大有助于增强革命的观点。读了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以后，认真地联系实际，思索一下，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革命观点，经常地同群众同实际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很重要的。

（原载1964年5月28日《中国青年报》）

热情地欢迎和关心新生力量

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代，是新人辈出的时代。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战线上，许许多多年青有为的革命者，正在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对于这些年青的接班人，对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他还指出，在处理各种类型的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包括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整顿党的作风》)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必须从革命事业出发来观察这个问题，必须用共产主义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应该从其他的

角度出发来观察和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一切老的革命者，对于新的革命者，必须以极大的热忱加以欢迎，而不应该采取冷淡的、不欢迎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正确地对待新生力量，是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和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长期以来，我们全党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新的革命者加入了革命队伍以后，总是受到老同志的热忱欢迎和关心，总是成长得比较健康和比较迅速，从而使这些新的革命者也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地锻炼成为比较老练的革命者。正是这样，我们党今天才能拥有为数众多的、经验丰富的、比较成熟的老的骨干。

必须象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那样，把新生力量问题同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前辈所开创的事业，总是要交到年青的革命者手里来的。革命的接班人，代表着革命的前途，革命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要靠许多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在历史的长流中，先行者的作用，就在于为后来人指明方向，开辟道路，奠定始基，草创规模。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把宏伟壮丽的共产主义世界建设起来，终究要靠后来人，

要靠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的新生力量。爱护和关心新生力量，也就是爱护和关心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这个道理，对于一切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革命者来说，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那么，怎样才是爱护和关心新生力量呢？

爱护新生力量，关心新生力量，就应该深入地观察他们，严格地要求他们。一要看准，二要管好。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命运的大问题。龙种和跳蚤，是一定要严格地和细心地分辨清楚的。对于真正的革命种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看不管了呢？不能。他们的革命品质越好，越是优秀，越有培养前途，就越要反复地看他们，严格地管他们。看到他们有了毛病，固然应该管，应该及时地提出警告，诚心地给以帮助；看到他们有了进步，同样应该管，应该向他们提出更高一步的要求，使他们越来越红，越来越专，不断地革命化。不然，他们就可能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停滞下来，甚至走到邪路上去。新生力量朝什么方向发展，是必须密切注意的，决不可以马马虎虎。

爱护新生力量，关心新生力量，就应该放手地使用他们。要让他们去干。让他们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

经风雨，见世面，想问题，挑担子。革命的感情，革命的意志，革命的作风，革命的本领，都是从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不干革命，永远不会革命化，永远不会成为革命者。不挑革命的重担子，永远不会成为能够继承革命重任的成熟的接班人。经验丰富的革命前辈当然应该挑更重的担子，但是，不能老是让年青人靠着老前辈吃饭。年青人能够挑多重的担子，就应该及时让他们去挑多重的担子，并且逐步地加重他们的担子。他们会摔跤，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老是怕重担子压坏了年青人，不是爱护和关心年青人的办法。

放手使用新生力量，当然不是说，可以不必加以指导。跤，总是要摔的。但是，加强指导可以少付出一些代价，使年青人少摔一些跤。因此，又要放手使用，又要加强指导，两者都是为了使新生力量成长的更快更好，也都是为了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

以极大的热忱爱护和关心新生力量，说到底，就是要以极大的热忱帮助他们赶上老一辈，超过老一辈。新生力量有没有缺点呢？有。他们年青有为，朝气蓬勃，但是，同老一辈的革命者比较

起来，总是比较不老练、比较不成熟的。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所受到的锻炼，总要比老一辈的同志少一些；他们现在具有的知识和经验，也会比老一辈同志差一些。这是现状。但是，不能让他们老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要是他们永远赶不上和超不过老一辈，那么，将来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地把老一辈交来的重担子接过去，又怎么能够进一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呢？现在他们还是学生，将来他们应该赶上老师，超过老师。

在这个学生能不能超过老师、后人能不能超过前人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人说，能；一种人说，不能。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他是承认有这种可能性的。后一种人可以以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为例。她见到年青人就摇头，说："一代不如一代！"究竟是"后生可畏"还是"一代不如一代"？历史的发展早已作了结论：后人超过前人，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的，是正常现象。倒退，才是历史发展中的逆流，是反常的现象。九斤老太的悲观心理，只不过是旧社会里小生产者的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的经济地位和狭隘守旧的习惯势力的反映罢了。

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不仅根本不能苟同九斤老太的看法，而且应该比孔夫子看得更透，想

得更透。这就是不仅要承认后人超过前人的可能性，而且要通过主观能动作用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要把赶上和超过老一辈作为对新生力量的要求提出来，要把帮助新生力量赶上和超过自己作为对老一辈的同志的要求提出来。前人已经攻克的堡垒和已经获得的经验是后人的起点，后人应该攀登新的高峰。能够赶上和超过老师，才是最好的学生，才是最对得起老师，最能为老师增添光彩的学生。能够使学生赶上和超过自己，才是最好的老师，才是最尽责任、最有功劳的老师。学生超过老师，不但是学生的光荣，尤其是老师的光荣。

梅花开得最早，到了阳春三月，看到漫山遍野的百花赶上来了，就由衷地高兴——“待到山花烂熳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同志用精辟的譬喻写出的这种最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发扬的。至于作为后来者的“山花”，当然更应该感谢先行者的“梅花”，尊重她，围绕她，向她请教，并且学习她的高尚精神，同样用极大的热忱来欢迎和关心更加后起的群芳。

以极大的热忱欢迎和关心新生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会更多地、更快地、更好地成长起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有可能永远百花烂熳。

（原载1964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1963年

耐心把别人的意见听完

用什么态度去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这个问题，看起来好象很简单。可是，要处理得好，并不是很容易的。

比方说，有一些同志，在有的时候，就不大欢迎别人提意见，他们一听到别人提不同的意见就不耐烦，或者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打断他。或者干脆似听非听，不理不睬，给人家一个难堪。这些态度，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要那样做呢？

“因为他的意见不正确。”意见是否正确，当然十分重要，不能马马虎虎。我们应该分清是非，采纳别的同志的正确的意见，说服他们放弃错误的意见。但是，这不能成为拒绝听取别人意见的理由。别人的意见，你根本不听，或者不认真去听，或者没有听完，你怎么知道他正确不正确呢？

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提出了完全错误的意见，

这种情况，固然也有，但不很多。在更多的场合下，正确的成分是同错误的成分混在一起的。例如，提意见的同志，只注意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发现了某些现象，但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把一些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东西绝对化了；从一些正确的论据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等等。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意见，更要耐心听取，细致分析。只有耐心的听完它，并且谨慎地分析它，才能把握住其中正确的成分，剔除掉错误的成分。这样，对自己，对同志，都有好处。如果只要求别人提百分之百正确的意见，只对这种意见才肯耐心地听，那就几乎等于不让别人提意见了。

就是对于完全错误的意见，恐怕也以耐心听完为好。一个同志，认识有了错误，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改正过来。而要帮助他，就要了解他。原原本本地听他把意见说完，知道了他思想上的疙瘩，才能对他提出中肯的意见，解决他的问题，使他心服。何况，态度是会互相影响的。你耐心地把他的意见听完，他也总会比较冷静地来考虑你的意见。彼此都只说自己的，不听别人的，岂不乱成一团，还有什么好的效果可言？

话，本来是说给别人听的。我们自己说的话，总希望别人能够注意。别人向我们说的话，我们

也应该认真地考虑。只许自己说，不许别人说，只要别人听我说，自己不听别人说，总不能算是平等待人的态度。

一般地说，当自己对一件事情还没有定见的时候，别人的意见，总还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自己有了一定的看法，就不大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毛病。遇到问题，自己当然应该开动脑筋，不动脑筋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囿于一孔之见而不虚心去听取别人的意见，那就不好了。人的知识、经验、能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自己略有所得，便沾沾自喜，象装“满”了的瓶子那样，把盖子盖起来，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去，那就是堵死了自己继续进步的路径。

忠言逆耳。这句话也很值得我们警惕。当然，逆耳之言，未必都忠。但是，许多忠言，听起来确实是叫人不舒服的。对于在思想意识上缺乏修养的人来说，更是这样。办法有一个，越是不顺耳的话，就越要耐心的听下去；即使听得满头大汗、面红耳赤，也要耐心的听完。这些话，既然能使自己出一身大汗，可见是一副切中自己病根的良药，决不能把它当做耳边风，刮过去了事。

同志们肯对我们提意见，这是好事情。这是他们信任我们会认真地考虑这些意见。所以应该郑重对待，不能漫不经心。如果连听也不想听，

最后使人对你失掉了信心，有话不对你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这才是不幸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使自己落到这种地步。

（原载196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就地学起　就地做起

我们怎样向雷锋学习？让我们看一下，雷锋怎样向别人学习。

雷锋自己也有心目中的榜样。他向黄继光学，向邱少云学，向白求恩学……。他学他们，是就地学起，想一想要是黄继光、邱少云，白求恩处在这种环境下会怎么办，想了就做，做一个黄继光、邱少云、白求恩式的革命者。我们学雷锋，也要就地学起，想一想雷锋处在这种环境下会怎么办，想了就做，做一个雷锋式的革命者。

有些同志可能这样想："我要向革命的英雄们学习，但愿有同样的环境来考验我！"其实，不需要有同样的环境，只需要有同样的精神。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怕没有锻炼自己的环境，只怕没有锻炼自己的决心。干革命，不必找机会；要考验，不必找时机。时间就在眼前，地点就在脚下，只看你是不是把它当做考验，愿不愿就地考验自

己。自然，要求在一天之内学成与雷锋一个样子，这是不切实际的，雷锋今天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也是天长日久抓紧锻炼的结果。但这不要紧，重要的在于尽力去学、去做。这件事今天做了百分之五十，明天就有可能做到百分之一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学雷锋，就地学起。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共产党员应该从眼前所处的环境，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和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雷锋同志这样做了，我们学习他，就要学习这一点。

（原载196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要做勤务员，不要做官老爷

广东省澄海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余锡渠同志，在奉命接管县政府时，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打着一双赤脚。有的老乡同他开玩笑，说："哪有赤脚板的县太爷呀！"他答得好："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当官的，先要要要威风！共产党员打游击也好，当县长也好，还不都是为了领导群众闹革命！"从那个时候起，十几年过去了。当时是打赤脚的县长、现在是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的余锡渠同志，十几年如一日，一直保持着这种普通劳动者和人民勤务员的本色。他的这种高尚的革命品质，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和党的表扬。

"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当官的！"说得完全正确，必须把这一条界线划清楚。我们的党，是同国民党根本对立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同国民党控制下的反动政府根本对立的。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一切剥削阶

级的党和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截然相反，不仅不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而且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因此，在我们的干部同旧社会的官老爷之间，也存在着一条不容混淆的原则界限。我们只应该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勤务员，而绝对不应该做官老爷。能不能划清这一条原则界限，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来说，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和根本的认识问题。如果不能自觉地划清这条界限，那就叫做不懂得自己的身份和责任，就很容易把自己摆在错误的位置上去，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自己同群众的关系，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

"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当官的！"在这样一句斩钉截铁的话里，洋溢着多么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豪感，流露出多么强烈的对旧社会的官老爷的憎恨、厌恶和蔑视！旧社会的官老爷，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爪牙，是靠欺压群众吃饭的。做官是剥削阶级的特权。即使有少数人原来出身于比较贫寒的阶层，一旦做了官，他们的阶级地位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成为有权有势有钱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有了官老爷的地位，过着官老爷的生活，当然也就出现了一套官老爷的作风。他们高高在上，神气十足，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贪污舞弊，敲榨勒

索；生活糜烂，大肆挥霍；一心只图升官发财，根本不管人民死活。他们从穿戴的服饰、说话的腔调一直到举止、神态，处处都要故意显得同老百姓不一样。所以，"赤脚板的县太爷"，当时确实是找不出来的。哪里由剥削阶级掌握着印把子，哪里就有这种官老爷，哪里就有这种腐朽的、反人民的官老爷作风。这种官老爷作风，是旧的统治阶级作风的最集中的表现，是人民群众最讨厌、最痛恨的。

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在工农群众以及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是在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同官老爷作风完全对立的作风，即人民勤务员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全新的、革命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风。他们不谋私利，专门为人；毫不特殊、平等待人，奉公守法，严以律己；廉洁朴素，艰苦奋斗。他们处处以普通劳动者自居，随时随地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人民的事业上，人民群众对他们有最大的信赖。长期以来，我们党的干部的这种作风，早就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地打碎了旧的官僚机器，建立了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即无产阶级专政

的政权。我们党为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老爷作风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并且坚持不懈地把党的传统的革命作风推广到全国各级国家机关中去。我们党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正象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成绩是异常显著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的国家里，领导干部赤着脚板同群众一起做活，坐在田头同群众亲密谈心，早已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相反，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中，要是有人想摆官架子，当官老爷，才是反常的和不允许的现象。

那么，能不能说，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干部身上，官老爷作风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干部队伍中作风不纯的现象，不仅现在存在着，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可能没有。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用列宁的话来说，"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①。我们的干部队伍这样大，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的环境又这样复杂。让我们想一想：会不会有一些人为了做官而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呢？列宁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

①《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3页。

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能没有这种现象。"①邓小平同志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②让我们再想一想，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下，在我们的队伍中，又会不会有一些人蜕化和官僚化呢？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就提醒大家，要防止一种实际存在的"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③。他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在苏维埃职员中能够产生很少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刘少奇同志也很早就提醒我们要严重地警惕这种现象，他说："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

---

①《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3页。

②《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③《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第251页。

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①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的干部中厉行着人民勤务员的好作风，这是指这种好作风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指绝大多数的干部的作风是好的；而并不是说，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就一点也没有官僚主义作风了。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个指示的含义是很深刻的。当我们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我们如果用官老爷的态度去对待群众，如果用官僚主义的作风去进行工作，那么，我们不仅不可能团结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根本没有存身的可能。可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我们的队伍中，会不会有一些人以功臣自居，滋长一种极端危险的优越感，从而向群众摆架子呢？因为有了政权，又会不会有一些干部，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企图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去进行工作呢？人民信任我们，要我们去管理各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不会有人滥用职权，损公利私，违法

---

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乱纪呢？人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提高，我们干部的生活也比战争年代有了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不会有一些人追求名利，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不愿再做艰苦工作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并且经常地反躬自省。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就要自觉地处理好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自觉，就很容易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或多或少地学上一些官老爷的坏样子。一个干部，如果染上了这种官老爷习气而不改正，发展下去，就会丧失做人民勤务员的条件。

余锡渠同志说得好："共产党员打游击也好，当县长也好，还不都是为了领导群众闹革命！"我们之所以不是国民党当官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有了这样一份革命的心思，在革命胜利以前，才敢于打游击，坚决不做逃兵。有了这样一份革命的心思，在革命胜利以后，才甘于做人民的勤务员，坚决不当官老爷。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而蜕化变质，正同经不起困难的考验而动摇变节一样，都是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到底是做勤务员还是做官老爷，正象在革命胜利以前，到底是做革命战士还是做逃兵一样，是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

为了帮助干部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党对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并且按照这个要求来进行考察干部、挑选干部和教育干部的工作。我们党经常地向干部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进行革命方向的教育，进行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的教育，大力帮助干部端正思想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们党十分重视组织干部参加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使干部在实践中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使每一个干部经常地受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因此，就总的方面说，确保我们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革命性，确保我们干部队伍的人民勤务员的本色，是完全有保证的。

至于从我们每一个干部来说，能不能始终保持人民勤务员的本色，归根到底，要看他本人是不是努力地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对于一些阶级觉悟很低，头脑里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来说，很可能，做官老爷要比做勤务员舒服得多，"体面"得多。这样，就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学上一些旧社会的官老爷的坏样子，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而对于一切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干部来说，他

们的看法就完全相反。他们把自己同官老爷的界限划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做官老爷，或者哪怕染上一点官僚主义的习气，都是可耻的；而做人民的勤务员，才是最光荣、最值得的。

（原载1963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1962年

发扬愚公精神

胜利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没有困难。但是，在革命的人民面前，一切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问题在于，对困难要有正确的态度。细细地寻味一下愚公移山这则寓言，可以使我们从愚公身上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愚公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第一，志大劲足，不怕困难。为了开辟一条道路，天不怕，地不怕，下决心要移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第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确定了任务，就卷起袖子，一锨一筐地挖个不停。第三，立定脚跟，坚决不动摇。听了智叟的冷言冷语，不仅没有打退堂鼓，而且据理批驳，更加发愤，一股劲儿坚决干下去。

愚公懂得人在变革世界中的作用。万事万物，莫不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人的作用，就在

于能够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根据客观规律，创造必要的条件，促成事物的转化。这叫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事在人为”。懂得这一点，并不容易。当人们还处在原始状态的时候，成天受老天爷的气，“不如意事常八九”，人就常常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在客观事物面前只是一个卑贱的奴隶，不可能有所作为。人们只是在实践中，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的过程中，才逐渐认识清楚自己的力量，逐渐从轻视自己的奴隶思想中解放出来，转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来积极的改造世界。愚公精神，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它告诉我们：人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改造世界。智叟不承认这一点。他遇到困难就低头认输，退避三舍，甚至“笑而止之”，企图阻挠愚公移山。智叟之“智”，反显其“愚”。

愚公也懂得怎样去实现人的作用。客观世界，光凭嘴说，是变革不了的。一定要动手去做，才能把事物转化的条件创造出来。譬如扫地，坐着不动，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而做，又必须根据客观的规律，采取切实的措施和步骤，才能收到实效。譬如种庄稼，违反了作物生长的规律，揠苗助长，蛮干一通，尽管累得汗流浃背，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愚公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知

道大山的分量，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他善于从点点滴滴、扎扎实实的工作着手，去实现远大的理想。他把大山分成许多小的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挖。他不仅准备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艰苦奋斗，而且要子子孙孙继承大业，长期努力。他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甚至连"焉置土石"的问题，愚公也找到了"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的出路(《列子》《汤问》篇)。愚公的雄心大志和他的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人的力量，不仅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细小的变革，而且可以作出重大的变革。但是，做大事和做小事，毕竟不一样。其间的区别，就在于小事小难，大事大难。否认这种区别，想同扫地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大山移走，是不切实际的。存着这种侥幸心理，就不可能有真正坚强的意志，一遇到风浪，就会动摇不定。只有正视这种区别，把这种区别看透，想通，懂得了要赢得大胜利必然会遇到大困难，必须去克服大困难的道理，在精神上有了相应的准备，才可以变被动为主动。象愚公那样，在正确地估量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的基础上，立大志，使大劲，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自觉地迎接困难，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同困难作斗争，什么大困难不能克服，什么大事情

办不成功？

愚公移山的寓言，提出了一种用愚公精神来变革现实的设想。寓言的作者，安排了一位上帝来发善心，成全了愚公的志愿。其实，如果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善心上而不是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愚公就不成其为愚公了。所以，寓言毕竟只是寓言。

我国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才真正证实了愚公精神的威力。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经号召全党同志，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全党同志发扬了愚公精神，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回，感动了真正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山，终于把它们通通从自己头上掀掉了。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建设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地位。自然灾害不时在同我们为难。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更无时无刻不在同我们捣乱。人穷志不短。我们从来没有妄想过敌人会来发慈悲，也不幻想坐等自然的恩赐。为了战胜敌人，征服

自己，实现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扬愚公精神。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愚公。他们经得起困难的考验，越有困难就越是要干，困难越大就干劲越足。福建省建阳县六十二岁的共产党员黄仁盛同志，就是当代的一位新愚公。他以身作则，带动群众，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用了五年时间，把一座荒秃秃的堵林山建设成为全县第一茶山（1961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我国需要更多的新愚公。人人学愚公，自强不息，把六亿五千万双手一齐挥舞起来，在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一定可以画出人间最新最美的图画来！

（原载1962年1月6日《人民日报》）

做 老 实 人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1版，第3卷，第844页)革命要靠老实人，建设也要靠老实人。要革命，要建设，就要做老实人。

老实人说老实话。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非就非。不夸大，不缩小，不隐讳，不瞎说。根据事实说话。句句对人民负责。

老实人办老实事。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讲价钱，不怕困难。担子越重就越是要挑，事情越难就越是要办。做起工作来，认真负责，扎扎实实，有头有尾，越做越细，一丝不苟。不嫌麻烦，不存侥幸心理，不图表面好看。做出来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经得起考验。

老实人对自己同样采取老实态度。不懂，就承认不懂，老老实实地学。不装腔作势，冒充高

明。错了，就承认错了，老老实实地改。不文过饰非，一错再错：

有一种说法："老实人吃亏。"

其实，老实人自己根本不这样计较。老实人打的算盘，是全国人民的大算盘，不是自己的小算盘。只要对人民有好处，自己吃点亏，是值得的。

如果要东西的时候把手伸得很长，给东西的时候把手缩得很短，净想占人便宜，净怕自己吃亏，这样的人，不是老实人。

老实人到底会不会吃亏呢？归根到底，吃亏的不是老实人。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想占便宜，到头来总要跌跤子，吃大亏。老老实实，不怕吃亏的人，人民才信任他，支持他。

有人取笑老实人："老实人傻。"

的确，老实人是有那么一股子"傻"劲，他们心甘情愿做"笨"事。

但是，如果把老实人当做愚蠢，就错了。真正聪明的人都是老实的。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非老实不可，越老实，越接近真理。不老实的人取笑老实人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最愚蠢。

剥削阶级自己最不老实，也最怕别人老实。他们需要制造和散播"老实人吃亏"和"老实人傻"的语言，来为自己辩护，奚落别人，引诱一

些人离开正路。

这些语言，还反映着旧社会中老实人受气的状况。在旧社会里，“吃得开”的人，从政客到奸商，有几个老实的？时代的先行者，从革命家到科学家，开始的时候，有几个不被看做“傻子”的？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在无产阶级革命者中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讲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语言：“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同上）这才是真理。

还有一种说法：“老实人志气不大。”

志气不大，应该反对，必须反对。眼光短浅，苟安现状，是一种很危险的病。得了这种病，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

但是，老实人同庸人根本不同。因此，把雄心大志同老实态度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对的。

真正的老实人，看得最远，抱负最大。为什么不屑计较一己的得失？因为热心于六亿人民的大业。为什么兴高采烈地去做点点滴滴的工作？因为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远大壮丽的奋斗目标。

亲身参加实际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人，不难懂得雄心壮志和老实态度只能结合不能分开

的道理。

要把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事业建立起来，就要一炉一炉地炼钢铁，一棵一棵地种庄稼，一步一步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要把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就要做好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就要注意做好一个人一个人的工作。

志气要体现在实践中，不要停留在口头上。空谈困难，困难不会消失。空谈胜利，胜利不会跑来。空谈雄心大志，雄心大志不会自己实现。

列宁说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这个政权得到保障以后，在着手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基础以后，""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主要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6页)他又说："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列宁全集》第28卷，第83页)

少说空话，多做实事。我们大家都应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去实现光辉灿烂的理想。

(原载1962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要靠说服力

做思想工作要靠说服力。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只能靠说服力解决。

“用点压力不行吗？”

不行。用压力，不能解决思想矛盾，只能扩大和加深思想矛盾。想用压力去解决思想矛盾，好比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在思想工作中，说服力越充分，效果就越好。

“什么叫做充分的说服力？”

一说起充分的说服力，很容易使人想到，一定要驳得对方张口结舌，理屈辞穷，原形毕露，无所遁逃。同敌人进行论战，为了粉碎敌人的论点，擦亮群众的眼睛，我们需要这样的说服力。

在人民内部做思想工作，我们所需要的充分的说服力，是要使对方口服心服，心悦诚服，自己下结论。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对方自己下结

论。越俎代庖，是没有用处的。自己下的结论，同别人代下的结论，作用大不相同。只有自己下的结论，才是生了根的东西，才能够支配行动，发挥作用。

“那么，怎样才能有这种充分的说服力呢？”

想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先要研究一下，不同的意见是怎样形成的。在人民内部，根本的利害是一致的。意见之所以不同，在许多场合下，是由于各人据以出发的事实不同，据以思考的方法不同。有的人，占有的事实比较充分，有的人，占有的事实比较不充分。有的人，比较懂得辩证法，有的人，比较不懂辩证法。从不同的事实出发，可能产生不同的意见。以不同的思想方法去分析研究问题，即使面临着同样的事实，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见。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果带着非无产阶级的偏见去看问题，当然就不可能洞悉真理，就会有意无意地歪曲真理。

尊重事实、服从真理的人，在人民群众中总占绝大多数。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取消了进行思想工作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有共同的事实作为出发点，只要我们有共同的思想方法作为分析研究的准绳，意见总会

趋于一致。

想让别人作出和自己同样的结论，还要想一想，自己的结论是怎样形成的。难道自己的结论，不正是从一定的事实出发，遵循着一定的思维原则，经历了一定的认识过程才得到的吗？想说服别人，就要帮助别人，也来经历这样的认识过程。就是说，让别人也来注意这些事实，也来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研究这些事实。

这就需要摆事实，讲道理。

仅仅把结论告诉别人，还不足以服人。更要紧的，是要把事实和道理讲清楚。如果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反而被别人列举的事实和道理说服了，那也很好。我们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应该从善如流，不要坚持错误。如果自己掌握的事实和道理是充分的、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的，那么，在讲清楚了以后，让对方作出同样的结论，使彼此取得共同的语言，也就不困难了。

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摆事实，讲道理。"说服的力量，正在于这里。但是，"怎样摆事实、讲道理呢？"

要针对着对方思想中的症结，也就是针对着对方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去摆事实、讲道理。人的思想，不可能没有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运

动，才能够最后解决矛盾。当一个人的认识陷于片面的时候，他的认识不能不同客观事物相矛盾。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必然要反映到他的思想认识中来，从而构成为主观认识中的内在矛盾。针对着对方思想中实际存在的内在矛盾去摆事实、讲道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韩非子·难势篇》），往往比“以我之矛，陷子之盾”更好，更能促进对方豁然开朗。

针对着对方思想中的内在矛盾去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用群众自己的经验去说服群众自己。所谓“说话要看对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都是这个意思。

1927年初，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湖南农村中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说：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

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当时（1927年）当地（湖南）的农民群众中，既存在着传统的迷信思想，又产生了先进的革命思想。这是农民群众还没有自觉到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把这个矛盾揭开了，使农民自觉地认识到这个矛盾，帮助农民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同志说的都是农民的心里话，都是农民了解的事实和懂得的道理，都是农民自己的经验，深入浅出，亲切动人，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家笑了，这就是大家下了结论，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心悦诚服地下了结论。

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说服力——用群众自己的经验去说服群众自己。

要说服群众，就要懂得群众心思，摸准对方思想中固有的矛盾，把思想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要说服群众，就要相信群众觉悟，发扬对方思想中固有的积极因素，促进对方思想中内在矛盾的发展。

用群众自己的经验说服群众自己，有充分的说服力。我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要靠这样的说服力。

（原载1962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

用商量和请教的口气说话

用什么口气说话，这同一个人的作风，关系相当密切。言如其人。一个人，有没有民主作风，能不能平等待人，是不是真正打心坎里尊重别人，常常可以通过他说话的口气反映出来。

老师对学生，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在许多场合下，用命令和说教的口气说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同志之间的日常的交往中，最好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呢？

在同志面前，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小学生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知心朋友的位置上，那么，起码总要用请教和商量的口气说话吧！否则，至少不大象一个小学生的样子，不大象一个知心朋友的样子。

知心先要交心。言为心声。说话，无非是心声的交流。用商量和请教的口气说话，给对方留出说话的余地，别人才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这样，双方的思想、观点、感情，就可以比较顺畅地交流起来。做到这一点，无论对于个人的进步和同志间的团结，都会有好处的。

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情，固然要如实地承认没有把握，向别人请教，同别人商量；就算有了一些把握，多请教，多商量，也会得到教益。即使是对别人提意见，用商量的口气说出来，也总比盛气凌人地强制别人服从自己要好。话，是说给别人听的。道理很对，态度不好，使人一听就引起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实际的效果就难免会打一点折扣。

见了比自己经验多、水平高的同志，用商量和请教的口气说话，这并不难。如果认为对方不如自己，优越感油然而生，对别人不那么尊重，命令和说教的口气就会不可遏制地随之而出了。

经验多少，水平高低，常常是相对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韩愈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诗经》上也有两句话说得很好："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鹤鸣》）玉，当然比石珍贵得多。可是，石对于玉，尚且可以起到切磋琢磨之功。何况自己未必是"玉"，别人也未必是"石"。

对自己的同志抱优越感，这是一种落后意识、

低级趣味。常常有人自以为有本事、觉悟高而瞧不起人。其实，自高自大，不过是见识短浅的人的一种通病，是思想水平不高的一种具体表现罢了。自恃优越，我想，恐怕总是没有多少道理好讲的。

请教，要真心请教。商量，要真心商量。真心请教，真心商量，有了这样一片真心，自然就会采取请教和商量的口气。口气这个东西，是做作不来的。去掉优越感，学会尊重人，口气问题也就随着解决了。

遇到别人用生硬的口气说话怎么办？不要计较。要是赌气不听，这同样是不利于思想的交流、不利于自己的进步、不利于同志间的团结的。对自己，要求应该严格。对别人，不要苛责求全。大家都抱这样的态度，事情就好办了。

（原载1962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

不能"揠苗"，但要"助长"

"揠苗助长"这个寓言，流传了两千多年。寓言中的主角，犯了"揠苗助长"的错误。说得确切一点，他是犯了"揠苗"的错误。至于"助长"，那倒是庄稼人的正事。全部庄稼活，上肥，浇水，锄草，除虫，无非都是"助长"。所以，"助长"的精神并没有错，错只错在"揠苗"。

对人，也要"助长"。一个人的进步，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有外力的帮助。孩子满了七岁，要上学，受教育，这是"助长"。青年人，组织上让他到劳动中去，到工作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这是"助长"。他做得对，做得好，同志们支持他，鼓励他，这固然是"助长"。他有错误，跌倒了，同志们指点他，批评他，帮助他改掉错误，搀他起来，继续朝前走，这也是"助长"。

"不是说要靠自觉吗？"要靠自觉。脸上有污

垢，旁人可以代擦。思想上的污垢，只有自己才能擦掉。所以，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脸上的污垢是不大容易看到的。即使自觉性较高，经常照镜子，也难免有失于检点的地方。要是自觉性低一些，还没有养成照镜子的习惯，就更不容易察觉到自己脸上的污垢。因此，需要互相帮助。你发现了他的缺点，提醒他，批评他，也就是帮助他自觉。他觉悟了，就会自己动手来擦。

“他不擦怎么办？”要规劝。善意地规劝，耐心地规劝，反复地规劝。要讲道理，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要讲究方法，要寻找对他最有效的方法。这样做，当然比采取简单的办法难得多。不过，我们就是要做这种难事。革命者是不怕做难事的。

如果他脸上实在脏得不行，那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他大喝一声。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不会伤感情吗？”内容正确，方式适当，批评就不但不会伤感情，而且，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正是增强了同志间的友谊。生了阑尾炎，医生来开刀，当然很痛，病好了，病人总是感激医生。

而真正为病人着想的医生，也总不会因为病人怕痛而不去治他，不去救他。对待生理上的病要这样，对待思想上的病也要这样。我们要把友谊建立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建立在共同进步的基础上。

"不是说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吗？"要看是什么问题，是原则问题还是"小节"。刘少奇同志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对于自己"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可见，在"小节"上，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其他同志的要求，"不要过分严格"。至于在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就必须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轻描淡写。在大的问题上对同志提出严格的要求，也正是对同志负责任——"爱之弥深，责之弥切"。

正确的批评，好比锄草。锄掉了杂草，禾苗就会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当然，锄的时候，要很谨慎。有经验的老农，下手很有分寸，既锄了草，又不伤苗。生手，莽汉，就难免会出点问题。出了问题，要总结经验——谨慎，小心，向老农学习。不过，杂草还是要锄，不能干脆放下锄头袖手旁观。

（原载1962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1961年

从思想教育入手

不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从提高思想入手。

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对工作的想法不一样，或者想得不清楚，那么，即使一再督促，三令五申，花很大力气，工作却进展不大，收效不显著。要是换一种方法，首先敞开思想，把各种疑问和意见都摆出来：凡属糊涂的认识，一一加以澄清；思想上的疑虑，一一给予答复；各种不同的方案，一一仔细比较，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大家的思想真正通了，工作就顺利得多。

工作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对没有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干部，如果简单地斥责一顿，处分一下，把他调开，重新换人，工作不一定就有起色。要是换一种方法，首先帮助他分析工作没有做好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团结他，鼓励他，工作就能很快转变。

这里边有深刻的道理。

思想是人的灵魂，人的行动要受思想的支配。各人的觉悟水平不同，认识问题的能力有高有低，工作的效果也大不相同。一个人的自觉性高，思想对头，认识清楚，就有了做好工作的基础。工作起来，就有力量，有干劲，有积极性。即使遇到困难，他也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我们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以前，总要分析形势，学习政策，弄清楚工作的目的、意义和做法，弄清楚可做和不可做的界限，也就是为了提高认识水平，能够自觉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就无往而不胜利。而且所做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经得起考验。不然，即使有了正确的主张，但是人心不齐，就做不好。不管思想通不通，硬要去做，不是强迫命令，就是包办代替，就算一时做得象个样子，迟早要"回生"，做了也等于白做。

当然，即使一开始就注意思想工作，也难免还有一些干部会犯错误。对犯错误的干部，也应该着重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人犯错误，是常有的事。立场错了，固然一定要犯错误；认识不符合实际，也会做错事情。就一般情况说，犯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认识错误，接受教训，坏事就可以变成

好事，错误就成了一面镜子，使犯错误的同志，也使别的同志，知道怎样去鉴别正确和错误。以后，大家再遇到这一类事情，就等于打了预防针，有了免疫力。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仅仅从组织上处理一下，调动一下，犯错误的人还是糊里糊涂，别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对干部、对工作都没有好处。

部署任务，组织力量，都是很要紧的。否则，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会流于空谈。但是，如果把领导工作仅仅局限于组织上的领导，不注意思想上的领导，就不能够完满地实现真正好的领导。

从提高思想入手这一种领导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朝历代的剥削阶级，都奉行这种愚民政策。他们对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对统治集团中的被领导者也实行着愚民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真理。我们共产党人，则一反其道而行之。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闹革命，搞建设，都必须拿革命的真理去启发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真理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形成最伟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的党在一切工作中总是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对人民群众如此，对干部、对党员也是如

此。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1095页）这是一个极宝贵、极重要的指示，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原载1961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附录：

七律·哭安子文同志

其一

天道何年失晓昏？
人间泾渭孰清浑？
冯唐符节临淮水，
魏尚车骑到国门。[1]
振聩启蒙人不老，
吐哺握发席难温。
谢安亦有千古恨，
才出东山便招魂！

其二

何必庙堂勒石铭，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党中央派人到淮南，接子文同志回北京。

君身自是党人型！
平生五系南冠缧，①
行止一遵北斗星。
推举贤能扶正直，
睥睨狐鬼扫膻腥。
从今更激黄河水，②
砥柱中流洗汗青。

（原载1980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

①子文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曾四次遭阶级敌人逮捕，十年浩劫中又受康生等迫害，五十年内，五次入狱。

②子文同志的骨灰，将依照他的遗言，洒在晋陕之间的黄河中。

少年游·为母校
上海南洋中学九十周年寿

母校上海南洋中学，九十岁了。填词祝寿，兼呈师友。

少年负笈走龙华，
沐露揽朝霞。
芥子精深，
星河浩瀚，
知识信无涯。

多情恰似长流水，
岁岁浪淘沙！
小雨润酥，
和风醇醉，
着意护新芽。

（原载1986年11月2日《光明日报》）

跋

人民日报出版社要我把报刊上发表过的东西结集付梓。这不难，因为我替报刊写的东西本来极少。浩劫之前，敝帚自珍，倒也保存过一套剪报，但它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合当在劫中尽数失散。1978年以来，也偶尔提笔，但都是随写随登随丢。尽管如此，编目却极简单：把屈指可数而又记得的几个题目* 及其出处和大致时间开出单子来，几分钟就可了事。遗漏也许会有，但如果连作者本人都把题目和出处忘得一干二净，可见绝无收存的价值。

编目之余，照例得给集子起个名字，却颇费踌躇。

---

* 幸欤不幸欤，反正我得感谢吴国光同志。经过他的爬罗剔抉，使这个干瘪的单子居然增加了好几篇。

我为报刊撰文，尽在夜深人静之际。《幼驹》是今年元旦之夜写的。《哀思》是在先舅父吴世昌教授大殓前夜写的。六十年代为《中国青年报》撰稿，也都在夜间，无一例外，——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电话铃一响，如果是《中国青年报》编者廖寿衍同志的声音，“老鲍，写一篇吧”，照例盛情难却，勉力为他加个夜班，第二天送出。按照此情此景，似乎可以名之为《夜记》，可惜茅盾先生已经用过；如果叫《灯下集》，又与吴晗先生的集名雷同：只好打消了效颦之意。

上面说过敝帚自珍，因此倒不如把这几篇小东西合称为《敝帚一把》。自珍是事实，毕竟是自己劳动的一种结果。敝帚也是事实，其说有二：第一，它们只不过是扫帚而已。扫帚之为用，正与抹布相同，都是打扫尘土的东西，但本身又并不高洁，难登大雅之堂。第二，它们也确实敝。有些文字，是多年以前写的，尽管当时也许有点新意，可是事过境迁，早已失去了针砭的对象。比如，《要靠说服力》和《从思想教育入手》，是曲曲折折地针对当时频繁的过火斗争和组织处理写的，现在当然不再有耐人寻味的余地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是针对当时某些人视知识分子为异已而写的，现在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了。还有一篇小东西，题目叫做《发明者应当受奖励》，今天的

青年读者一看题目准会哈哈大笑，以为我是在同风车搏斗；不过这种风车确实曾经存在过。集中有几篇文字是最近写的。比如《哀思》，其中至少有一句话："共产党员应该而且可以向非党人士学习党性"，也许还有几天现实意义可言。但是，依初衷而论，我是但愿我当时所见到的尘土统统成为陈迹，从而使我这几篇"新"东西也都能速朽而成为谁都不屑一顾的敝帚。——朽得越速，说明我们社会进步得越快。有了以上两点颇为立得住脚的理由，于是下决心命名为《敝帚一把》。是为跋。

1987年1月20日，也是在夜深人静之际

〔**附记**〕我把一首诗和一首词作为附录而不列入正文。《七律》是对我所敬重的长者安子文同志的悼念。《少年游》是为母校上海南洋中学九十周年写的。我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诗，还有一首叫《寒暑表》。很短，区区八行，如下：

站在落寞的一角，
勇敢地忍受着命运的戏弄，
献身于为他人的工作，
直到身碎的一分钟。

* * *

漠然，峭然，

面对着肃杀的到来，
以自己腥红的血水，
指示人间温暖的存在。

这首诗登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上海《大公报》副刊《文综》版的右上角，写的是一个中学生在白色恐怖下的心声。1966年8月抄家前，这份剪报一直保存在我手头，但现在已找不到原文，姑且根据记忆在这里附记一笔。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1987年
　　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同年轻的朋友们谈谈心
　　谈方法——为《方法》杂志创刊作
1986年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政企分开和工作效率——谈谈改革的一种思路
1980年
　　论淘汰在新长征中势在必行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意见
1979年
　　发明者应当受奖励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笔记
1978年
　　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
　　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几点看法
　　日新月异和标新立异
1964年
　　明辨是非的两个基本条件——读《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笔记
热情地欢迎和关心新生力量
1963年
耐心把别人的意见听完
就地学起就地做起
要做勤务员，不要做官老爷
1962年
发扬愚公精神
做老实人
要靠说服力
用商量和请教的口气说话
不能“揠苗”，但要“助长”
1961年
从思想教育入手
附录
七律·哭安子文同志
少年游·为母校上海南洋中学九十周年寿
跋